

保衛新聞言論自由！反對京官干預！



台灣大選面面觀

立即停止壓制！釋放法輪功等異見者！

仁政還是苛政？助貧還是欺貧？

中國加入世貿為帝國主義廣開門戶

「反世貿」運動內望 車臣戰爭的後遺症

工人是歷史的動力 《先知三部曲》評介

英國工黨左派改良主義的局限性

保衛新聞言論自由！反對京官干預侵奪！

微波

香港有線電視播出了專訪台灣候任副總統呂秀蓮的報道，京官針對呂秀蓮的談話使用極強烈的字眼予以痛罵；緊接著，港區人大、政協及其他親京人士，也不甘後人地發表響應京官的言論，其中以徐四民的發砲最賣力，他除了罵呂為漢奸、賣國賊之外，且特別指責本港一間電視台為呂秀蓮談話提供方便，破壞到國家統一，認為傳媒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要顧及國家的主權及體面，要自律。他又認為，「香港有線電視公開訪問台獨的言論，是增加《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速度的契機」，主張港府盡快制訂禁止顛覆等罪行的法例，不應再拖。

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於翌日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響應徐四民的指責，宣稱香港傳媒有責任和義務配合國家政策，「不能散佈、鼓吹『兩國論』和『台獨』的言論」，不應把這些言論當作一般的新聞報道來處理，也不能當作一般的不同聲音來報道。」

王鳳超的言論立即引起傳媒團體、香港大律師公會和許多報章、學者的強烈批評、反對。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對該番言論表示「震驚」及「不安」，認為嚴重損害新聞自由，「若果香港傳媒成為維護國策的工具，傳媒的獨立性及公信力將喪失殆盡，新聞自由亦無從說起。」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7卷 第2期 (總第200期)

2000年4月30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103號三樓前座

電話：9846 342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國際電腦網絡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Internet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鯉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00

空郵：亞洲US\$18.00

其他US\$22.00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並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張健波即席表示不同意王鳳超的觀點：「新聞就是新聞，公眾有知的權利，新聞一定要是將新聞事件和人物力求如實、客觀、公正地報道出來」，只有這樣的報道，「才是對國家最有利。」

我們完全贊同上引對王鳳超言論的批評意見，同時要指出：他的言論是以中央駐港高層負責人身份，企圖干預香港的新聞工作，違反了中央過去所作的不干預承諾，威脅到香港新聞工作的獨立性，侵奪香港傳媒在過去所享有的新聞言論自由，而把它們逐步變成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傳聲筒、同一口徑的工具，變成同內地報刊一樣的角色，從而剝奪港人知的權利，導致港人看不見盡可能全面的事實真相，聽不到與中央官方不同的聲音。

王鳳超的發言也是響應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喬曉陽的主張：香港應該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制訂出禁止分裂國家進行顛覆等活動的法律；這也顯示其立法的目的之一，是要大大限制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可以動輒用「煽動叛亂」等帽子入罪港人。同時，其打擊的對象，包括法輪功學員（他們仍然在港公開煉功），以及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經常發放國內人民爭取民主而遭鎮壓的消息，這些活動都被視為違反中共所定的「國策」，必須加以禁止的。中共和中央政府對每一個較重大的問題都有其既定的政策立場，如果規定港人都必須與之相一致，不能違反，那就是把統治內地人的一套都實施於香港，港人原來享有的自由權利都被剝奪，再沒有什麼「特別」地區的兩種不同了！

一些港區人大代表爲了沖淡王鳳超這番言論的震撼性，緩和港人的反對情緒，竟辯稱那只是後者個人的意見。但是，北京的負責官員卻表示，王的意見正確，亦代表中央的政策；而在港中聯辦有關負責人也聲稱，中聯辦是完全贊同他的。這表明並非純是個人意見。事實上，在中共的體制內，除了最高層領導人之外，其他官員的公開發言都不能純屬個人意見，而只能是執行領導層定下的政策、主張的。

在京官不斷催促加快第23條立法的壓力下，特區保安局局長在回答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政府正就這問題搜集資料及研究；且在作公眾諮詢前，「須

與中央有關部門交換意見」。由此又一次表現出，特區政府所定的有關法律，必須與中央的意見相一致，《基本法》條文所列的特區「自行立法」，不過是形式上的說法。

正當香港市民的各種自由也受到威脅、會被逐漸剝奪的時候，特首在加拿大卻針對台灣人民可以直選主要領導人的事件，仍公開宣稱香港比台灣民主。民主，最通俗的解釋就是由人民作主。港人可有哪些「作主」的權力呢？他們連選舉即使無實權的區議員的權利，在特區成立後也部份地被委任制所奪去；立法會組成條例規定只有3分1的議員由港人直選（今年只增至60席中的24席），幫助了保皇派、資產階級代表、親京人士等勢力佔有多數，甚至特製了一套機制，必須在分組點票中都得到多數才能算是通過，由此使立法會實際上變成了政治花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發揮代表多數港人立法的權力；港人普選特首的應有權力，也被官方變相地委任組成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所取去。所有這些，都說明港人完全沒有當家作主的權力，享受不到任何實質上的民主。難怪特首的「香港比台灣民主」的神話，經不起記者當場的揭破：爲什麼台灣人民能直選主要領導人，而港人卻不能？」他只好說「不答這個問題，改答其他問題」了。

台灣的大選給港人上了很好的一課，從彼岸的這種進步中得到啓示，提高了追求民主權利的認識和信心。他們長期以來從港英政府手中爭取到不少自由權利（但仍不是民主權力），不會輕易地再讓這些既得的自由給新的統治者奪走。近日來市民、團體，有識之士紛紛表態反對京官對港人新聞言論自由的設限箝制，有許多民間團體、學生會代表、民主黨派等方面人士遊行到中聯辦示威、提抗議，都顯示出香港廣大民意是不可欺的。港人要團結組織起來，堅決有力地反對任何干預、侵奪香港人民（包括新聞工作者）採訪、報道、言論、出版等一切自由權利，要全力加以捍衛，而不能保持緘默、容忍，否則京官及其追隨者就會得寸進尺，爲所欲爲！

（2000年4月15日）

仁政還是苛政？助貧還是欺貧？

振言

財政預算劫貧濟富

港府強調連續兩年財政預算出現赤字，必須達致收支平衡，要大力增加稅收，節省開支，但現時擁有4千萬億元儲備和1萬多億元外匯基金，而財政赤字卻共只有二百多億元，不會構成問題。而且，港府多年來每年的財政預算，都有幾百億元的誤差，例如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預算，原來有赤字365億元，結果反而有99億元盈餘，高估了464億元財赤。

在這次宣佈下年度財政預算案之前，高官們大呼不應再有財赤，必須增加稅收，包括開徵陸路離境稅和銷售稅。由此激起全港的普遍反對，特別是激烈反對開徵上述兩新稅。許多市民，由於恐怕即將增加牌照等收費，都排成長隊趕著交費，而財政司在宣佈新預算的前一天，還公開聲稱：市民對加稅加費要有心理準備。從而誤導了更多的市民去排長隊。但實際上，卻是在群情反對的壓力下不予增加，顯出是拿市民「開玩笑」，愚弄市民，這樣的「狼來了」作弄已不止一次；財政司發表的下年度財政預算，沒有提出加稅及開徵新稅的建議，反而減低股票交易印花稅等等，特別優惠於有錢人。

但這也是緩兵之計。當局已聲稱「謀定後動」，不久將來，將陸續推出政府服務收費，例如水費、排污費、公屋加租等等。新預算案繼續不肯向獲得巨利的大集團提高利得稅率，以便大增稅收，而現行的16%利得稅率，也比新加坡、韓國及台灣等的25%至30%為低。

這明顯是向大財團、有產者施惠，維護其權益。

另一方面，新預算案卻沒有提出具體措施，去照顧低下層市民，培訓低技術的工人，改善工人的就業條件等等。這從它對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撥款可以看到。

社會福利的開支，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增長大為放緩，增幅從上年度的18.5%劇減至7.7%（下年度預算是9.2%）。社福支出中的綜援金支出增幅，從

98/99年度的31.7%，劇減到99/00年度的7.5%，今年至明年的預算是10.7%。由於綜援個案數目的上升，新移民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失業人數的高企，這樣的增幅顯然是很不夠的。當局去年大大收緊發放綜援條件，更普遍地大減受助的金額，比原預算節省了15億元，以致廣大貧苦家庭入不敷支，必須勒緊褲帶，生活十分艱苦。由於港府拒絕在70年代末實行供款性的社會保險退休保障計劃，拒絕在80年代末接納社會人士提議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拒絕在90年代中期實行老年退休金建議，一再推遲實行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才造成現時要實行綜援制度，令綜援的開支不得不愈來愈大。但今年的增幅，卻比95至99年這4個年度的平均增幅3成多大大減少，明顯是主要向老人開刀。它實行強迫參加義工計劃，已迫使4,500人退出領綜援。

「資源增值」實即裁員減薪

為了壓縮社福開支，當局對於社會福利機構的資助，又在改變手法，提出一筆過撥款的方案，這將會使各社福機構出現赤字，裁員減薪；有的機構便先實行增加員工的工作時間，為日後裁員鋪路。由此已引起48個社福機構2千多名員工代表的遊行抗議，反對一筆過撥款方案。

特首在1998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公務員體制必須推行資源增值計劃，所有部門主管，必須減少部門開支至少5%。這個命令就是要大力縮減支出。為此，新近提出的主要改革是：凍結招聘公務員，所有部門取消職位空缺；服務改外判；現職公務員繼續凍薪。而據說庫務局長還在考慮減公務員薪，且已在部份公務員中推行。在99年的公務員調整薪酬方案建議中，官津學校及文憑教席的入職級點，將由現時分別為17及14點，一律調低至12點，即由現時的22,000多元及19,000多元月薪減至建議的16,000多元，即要在教師行業中率先推行減薪政策。新入職的登記護士，則削薪3千元，減幅達兩成。較早前新聘用的公

務員，除了減低薪酬約3成之外，還要變相地試用6年才可能獲長期聘用，開啓了如此苛刻條件的先例，乘失業人士急需謀職之「危」，實行非常可恥的刻薄待遇，向其他的高度壓榨員工的僱主「示範」！

另一方面，港府又決定在3年內，從現時近20萬名公務員中削減1萬名人員，從而迫使各部門大肆縮減職位，被削減的對象，幾乎全是下中級公務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證實，根據資源增值計劃，今年至明年削減的880職位中，有95%是中下級公務員，首長級的只有3個，這便是顯例。

像這樣的厲行「資源增值」，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什麼「增值」。高官聲稱預計可在本年度內為政府節省10多億元的開支，可見所謂公務員體制改革、資源增值，只是美麗的遮羞布，實際上則是裁員減薪，向中下層員工加強壓榨、「開刀」。但對於高層享有的非常優厚的薪酬待遇，對於無數的驚人浪費（有如審計署每年不斷詳列出的事例），卻絕少甚至不予設法「增值」，即節省）。

當局的改革和「資源增值」的另一手法，是把許多部門的原有工作外判。除了有不少部門已開始推行外，房屋委員會將於今年逐步將15個屋村共6萬個單位的管理工作外判，合約總額高達12億元以上。這樣日益增多的外判制，結果之一就是迫使更多的原有員工失業，把他們驅入社會失業大軍中。另一結果是拉低工作待遇，互相鬥低薪。這種情況甚至出現在「為人師表」的各所大學中，它們為節省開支，將部份工作外判，使得受僱於外判的工人待遇很低，有些大學的清潔工每小時低至14元，同時，這些員工大部份都被剝奪了法定的休假日。

房屋署署長宣稱，預計在10年時間完成60多萬公屋管理維修服務全部私營化計劃，可以為房委會在10年內節省100億元的開支。這也意味10年內每年都有大量員工失業，為房委會和資產階級製造高度壓榨工人的利潤！

當局促使貧富懸殊加劇

在當局帶頭裁員的推動下，香港持續掀起裁員歪風，不但生意不佳的工廠、公司是如此，連年年大賺錢的大企業也不手軟。例如，匯豐控股去年盈利426億元，它旗下的匯豐物業（亞洲）有限公司獲利豐

厚，卻一再裁員約400人。去年獲利也很豐的中銀集團，一再裁減逾1成即2千名以上的員工。去年盈利63億元的中華電力公司，也一而再地解僱職工。

港府一向的政策都是極力維護工商業資本家的權益的，這次的財政預算案也沒有例外，它繼續拒絕增加累進所得稅、資產增值稅，反而打算開徵銷售稅、陸路離境稅，向低下層市民開刀，便是顯例。由於這種政策長期的幫助，使得香港社會更加向兩極分化，貧富日益懸殊：一極是大集團的利潤和資產劇增。例如，和黃集團在99年盈利1千多億港元，高踞全球首位（但在港納稅卻不到9億元），5大富豪控制著上市公司的市值，其中父子一家對電訊、電力、地產、超級市場都佔有市場很大的比例，情況類似於港英時代的英資壟斷財團；另一極是人數日增的低下層貧苦市民。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香港的堅尼系數，由71年的0.43大幅升至96年的0.52，比許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為0.43）還要差。而據港府統計處的資料指出：香港最貧窮的40萬個家庭，收入由97年的每月6,400元，下跌至99年的4,614元，跌幅達28%（3月2日《蘋果日報》報道）。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總結90年代的研究更顯示：全港最低收入的10%住戶，即約21萬個家庭，平均月入只有3千元，扣除通脹後的實質收入，99年比90年還要低28%，而最高收入的10%住戶的實質收入則大幅增長，較90年增加28%。只有最高收入的20%住戶，專享香港經濟繁榮的成果。（3月3日《明報》報道）

以上就是回歸後特區政府繼承港英殖民地政府遺風的其中一種「仁政」表現和結果！

更正啓事

本刊總第198期刊登的《美國打「中共間諜」牌》一文，現經譯者覆查，發覺有以下兩處應予以改譯：

- 1.第13頁左排倒數第10行的「有許多高加索人」（Caucasian）應為「有許多白種人」；
- 2.同頁右排第19、20行的「加州技術研究中心」應為「加州理工學院」。

特此向讀者致歉！

台灣大選面面觀

軍行

選舉的進步意義

台灣民眾能夠直接普選自己的主要領導人——總統，今年是第二次了！在這之前，他們又已直接選出全台各縣市長和民意代表，表現出他們可以自由地選出各級的領導人，順利地行使其選舉的民主權利，絲毫不受任何政黨的擺佈、干預。

這次的總統競選活動，早在一年前已經展開；在選前數月，全島已充滿熱烈的競選氣氛和活動，大型集會和遊行陸續在全台各地舉行；到投票前一天，有300萬人參加造勢，使全台沸騰起來；後來的投票率高達82.69%；這些都表現出台灣民眾珍惜和善用自已的選舉權利，要選出自己心目中的領導人。

在競選中，各候選人都互揚對方的錯失、穢史，盡量抹黑對手，特別是其他4候選人，全力猛攻執政黨的連戰，務求把國民黨的長期統治權推翻，而這樣做並不會像彼岸那樣被扣上「顛覆政府」的「罪」名。國民黨在大選中落敗，則必須和平地移交政權給勝利的新總統。

以上的情況表明，台灣民眾確實在享有民主自由權利，具有重大進步意義、應予以高度肯定，儘管這種民主仍然是有限度和資產階級性質的。

重大的缺點

正由於它的資產階級性質，越有錢的政黨代表便越多機會去進行競選活動，運用足夠的財力、物力、人力去幫助參選，以圖爭取更多的選票；反之，缺少財力等優越條件的候選人則難以平等地競爭，其聲音和主張不能普及地散佈給各個選民知道。而代表工農貧苦大眾的人士，則更難有物質條件出來參選。這些就是今次台灣大選所再次顯示出來的缺點。人民幾乎只有從傳媒中看到或聽到連戰、宋楚瑜和陳水扁三強鼎立爭雄競逐的情景和聲音，以及在街頭見到這3個人的聲勢浩大活動；其餘兩候選人則顯得無能為力。除此之外，也不見有代表工、農、貧民利益的人士參

選。

也是由於這樣，使得這次選舉再次出現買票賄選的情況。台灣立法院超黨派聯盟公開列出多種賄選洗票等手法，包括送贈金錢、禮物等，層出不窮；大排流水宴請客，更是大行其道，公然盛行。許信良在選戰中致連、宋、陳的公開信，質疑這場選舉活動所花金額不下一百億元（新台幣，以下同），對3位候選人大洒金錢造勢充滿憂慮，斥之為最壞的選風。

國民黨領導層深知這次選情不妙，為保政權不失，便要全力依賴賄選，而它的黨產中有非常巨大的資財可以大量運用於這方面。

國民黨黨產達天文數字，是幾十年來一黨獨大下搜刮民脂民膏和奪取社會財富所積累的結果。據台灣《聯合報》報道，依據劉泰英最新資料，黨資產總值約2千多億元。由於它有如此巨大的黨產，可動用不少來支持連戰，連戰本人也非常富有，因而極力依靠大洒金錢去進行活動。

關於國民黨人的賄選情況，從3月20日《蘋果日報》李八方專欄的報道可見一斑：他的朋友剛從台灣觀選返港，談及此行「發覺原來台灣，特別是年輕及中年一輩，對黑金、黑道的厭惡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對於收國民黨選舉黑錢，絕大部份人都不諱言有收，認為既是自己的納稅錢，國民黨派回就會收。的士車上插支旗可收1,300元，參加造勢活動一次收5,000元。但收錢後卻不一定投國民黨票。

國民黨的失敗

連戰在選前幾個月的幾乎所有民意調查中，都與陳、呂鼎足而立，相差幾個百分比，但選舉結果卻輸得很慘，證明許多民眾雖然利用了國民黨所派的錢、物，卻不投票給他，也反映上引台灣民眾普遍存有憎惡黑金政治的情緒。陳、宋得到最多和次多票數，與他倆都以反黑金政治作號召很有關係。這說明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清醒、認識水平很高。

連戰在競選中公佈了十項大陸政策，標榜他既反

統，又反獨，企圖爭取這部份選民。但無論怎樣裝璜，始終是在基本上執行李登輝的路線，拋不開「兩國論」的主張。他是台灣資產階級的代表，3大工商團體邀集30家集團大老闆，舉行擁連記者會，站出來為連拉票。但這些最終仍不能挽回他的頹勢。

國民黨統治了台灣54年，一直推行犧牲低下層民眾而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導致社會不平等增大，階級矛盾加劇，在黑金政治之外更增加了人民不滿的因素。例如，台灣的貧富差距逐年擴大，屢創新高。家庭高低所得，在98年相差5.51倍。民眾認為稅制不公平，未照顧到低所得者，應該課高收入者的稅課不到，薪資階級的稅一毛都跑不掉。這是國民黨主政下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表現之一，也是廣大低下層人民不滿國民黨而不願投連戰一票的其中一原因。

宋楚瑜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雖在政治上以清廉作號召，初時獲得頗多人支持，但在競選中給李登輝控告他侵吞國民黨3億多元資產的「貪污」罪，他的妻兒在美國擁有多間物業，用現金而不需貸款買下；這些都引起不少人的不信任。他雖傾向於主張台灣與大陸統一，但當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不久，他為了爭取李影響下的選民，竟然在公開集會上慷慨激昂地喊出「我比李登輝還要李登輝」的話，以表示他比李更堅決強烈地主張本地化，充份顯現他的政見含糊、立場搖擺不定的政客本質。

北京的打壓攻勢

在這次大選前不久，北京即發動心理、輿論攻勢，作出會揮兵攻台的恫嚇，意圖左右大選的結果。它推出了對台灣問題的白皮書，修改了動武的條件，把原來的「台灣宣佈獨立」擴大為「出現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將對台動武」（這一修改使中南海可作多種不同的解釋而找到動武口實）；它同時正式提出多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這是向台灣發出的駭人新信號！

在投票之前幾天，朱鎔基在記者會上聲色俱厲的反台獨講話，警告台灣人民不要意氣用事，切莫一時衝動後悔莫及（意即不要因不滿、反感北京領導人而偏偏去投陳水扁的票）；南京軍區一名將軍公開斷言：「陳水扁上台就意味著戰爭」；御用「專家」則宣稱：統一的時間表是24小時；唐樹備也發出威脅：

假如選舉出現「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兩岸的經貿往來勢將切斷。……這些都是文攻武嚇的一連串湧現。

但事實證明，北京這許多攻勢卻很少收到它的預期效果，反而激起部份人的反感，「弄巧反拙」地增加了民進黨的得票。陳參選期間，吸取到許多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主的支持（自然也有一些大企業家的幫助）。在三強競逐的情勢下，陳（和宋）以「消滅黑金」為口號，爭取到更多人的擁護。

選舉的結果

選舉結果是：陳水扁得497萬多票獲勝，得票率為39.3%；宋楚瑜得466萬多票，比陳水扁少31萬多票，得票率為36.8%；連戰得282萬多票，得票率只23.1%，得票數及比率大大低於選前民調的顯示。至於許信良只得近8萬票，佔0.63%；而明確主張統一的新黨的李敖更只得1.6萬多票，佔0.13%。

結果公佈後，中共的輿論又認為，陳只獲得不到40%的票，表示有60%的民眾是反台獨的。如果依照這樣的推論邏輯，則主張統一的李敖的得票比率，不是表示有98%的選民是反對統一的嗎？事實上，台灣民眾是怎樣評價選舉結果和民進黨上台呢？下列兩項民意調查可供參考：一是選後次日，台灣TVBS（無線衛星電視）的民調，有56%的選民滿意選舉結果；另一是同日《聯合報》的民調，則顯示有57%的民眾對民進黨執政有信心。（引自4月4日《蘋果日報》李怡專欄）

民進黨上台，正式結束了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時代。這是一次重大的歷史性進步。國民黨不斷的錯誤招致它的四分五裂和大選慘敗，不容於元老各派系的馬英九如果再宣佈退黨，則以連戰為首的國民黨將更加為台灣人民所背棄，更少再掌台灣政權的機會了。這種下場，是蔣介石屠殺無數中國人民、實行專制獨裁等罪行種下的最終結果，也是古今中外的反動專制統治者必將受到歷史懲罰的一個例證。

新政府的政策

陳水扁獲勝後，即進行組織新政府的工作，以便在5月20日就職執政。他首先選擇唐飛為行政院長，顯示其用意一來是要成立超黨派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要表示他與國民黨人合作，利用唐飛

的能力協助管治台灣，穩定局勢；二來以唐飛在軍隊中的威望，可撫平軍心，安定人心；三來用他來應對彼岸的軍事威脅甚至將來可能的攻擊，加強台灣的軍力。其他的新政府閣員名單，以技術官僚和學者佔很大比重，將會起推進與大陸改善關係和肅貪的作用。

李登輝大陸政策的重要幕僚陸續為陳水扁所選用，委任出多人為新閣及其他重要機構的要員，這種人事安排意味未來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仍將或多或少要延續「李登輝路線」，內外政策將會有較大的靈活性。

在各方面的巨大政治壓力（包括台灣多數民意希望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之下，又為了要加強在民眾中與其他政黨的競爭力，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將會被迫稍為收斂；黨內已出現一種聲音，要求修改黨綱中的「建立台灣共和國、制憲」等明顯有台獨意向的字眼，便是一種跡象。

陳水扁表示，新政府將以「改善兩岸關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為施政的重要任務。他一再重申對北京的「三不」政策：「在主政期間，台灣不會將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入憲，不會舉行統獨公投，不會變更國號」；此外就是：「除非中國企圖對台灣動武，發動戰爭，否則台灣不會宣佈獨立」（4月14日《成報》報道）。他又宣稱：「大陸10幾億人民或台灣2,200萬同胞，都有共同文化背景，也有相同血緣關係，像兄弟姊妹一樣，絕對要有智慧、創新改善兩岸問題。」（4月16日《文匯報》報道）

錢其琛重申江澤民的態度，認為對話談判要有一個基礎，就是首先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妥協，決不讓步」。對於陳水扁提出一個中國原則可以作為議題來談，京官回應是不會接受。

京官表示：如果台灣新政府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則海協會是不會恢復它與海基會的商談的。如此看來，海峽兩岸的對話、會談，將會因此而繼續停頓。北京將會繼續「聽其言，觀其行」，迫使新政府進一步軟化立場，接受北京的談判先決條件。

韓朝首腦會談的啓示

恰在北京堅持其上述態度的時候，韓國及朝鮮政府卻同時宣佈，兩國首腦將於6月舉行歷史性高峰會談。兩國均表示，是次高峰會談將有助於推進重新統一朝鮮半島的步伐，並結束雙方50年來的戰爭局面。

新華社記者於同日自漢城發出的新華社電，《文匯報》刊登時的標題是：《一項雙贏的決定——韓朝峰會具積極意義》，高度評讚雙方這項決定，認為「南北方最高領導人舉行首次會晤，將使雙邊對話掀開新的一頁，對緩和與穩定朝鮮半島局勢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該電訊繼續指出：「實現半島持久和平與穩定，是包括半島南北方在內的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近兩年來，韓國方面多次提議舉行南北當局會談以實現和解與合作，朝鮮方面也提出舉行高級政治會談等建議。此次雙方經過共同努力而達成協議，是這種共同願望的體現，也是當今世界祈望和平和發展的潮流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朝鮮半島南北方人民是同一個民族，有著割不斷的骨肉之情。半個多世紀的國土分裂使南北方人民飽受骨肉分離的痛苦。早日實現民族和解、交流、合作與和平統一，是南北方人民的夙願。而實現這一願望的最佳途徑是接觸和對話，而不是對抗和衝突。朝鮮半島南北方決定舉行首腦會談，符合朝鮮半島人民的利益。」……（詳見4月11日《文匯報》）

兩岸需要對話，不要戰爭

我們之所以較詳地引載這個評論，是鑒於它所談的與台峽兩岸的情況有許多相類似之處，其中有許多論述也應可適用於兩岸。而南北兩方今天已能邁開這一步，儘管其最後結果還有待於兩國首腦的會談能否達致對兩國人民有利的協議，但這總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對韓朝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這對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也應該是很適時的啓示。兩岸許多人民都會問，而且希望：既然朝鮮半島南北雙方能夠不設定會談的先決條件而進行會談，為什麼兩岸雙方卻不能呢？

再從實際來看，多年前海協、海基兩會所達成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靈活協議，其實也不是堅持北京所認定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則，而是容許台灣方面解釋為「一個中國」所指的是「中華民國」（她在1948年以前統治過中國大陸，國民黨曾聲言將來也要由她統一全中國大陸）。這樣的協議，實際上仍等於是容許存在兩國中國的內涵和互相對立的口頭表述。這也表示：北京並未堅持台灣當局必須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對於後一點，台灣當局及海基會也沒有公開地如此承認過）。

現在，對海基會恢復會談的條件，顯得比過去曾進行過會談的條件有所不同，至少是大為收緊了。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同對待呢？這除了為要打壓台獨傾向、迫使新政府作重大讓步、有如前面所指出的以外，還會有如下的政治意圖：極力強調台獨的危害性，以轉移國內人民對台灣大選所可能造成的追求民主的啓示，沖消台灣的民主效應。中國人民會從今天台灣的发展中了解到：台灣人民已有權獨立自由地直選自己的各級領導人；不同候選人能夠盡情抨擊執政的國民黨及其候選人，而且能夠以多數選票「顛覆」掉國民黨的「台灣中央政府」而不被扣上任何「罪名」；執政黨在敗選後便須和平移交政權給反對黨。所有這些重要事實，都在彼岸2,200萬人民中發生了，但在被號稱是「高度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中國大陸，一向被捧稱為「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2億5千萬人民，卻至今不能享有這樣的選舉等一切民主自由權利。為什麼不能夠？這樣的不能夠是應該再持續下去嗎？……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定會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腦中提出、思索，並追求得到合理解決的。

特區政府高官對這次台灣大選的評價，又表現出其「傲慢與偏見」。董特首仍然在外國記者面前大誇「香港比台灣民主」，但卻無詞答覆記者提出，何以全體香港選民不能直接選出香港行政長官這個問題。而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更出言嘲諷，說台灣選舉所以有超過8成人投票，是黑金政治造成；此外，還因為選民的「利益受損就投入，如果沒有受損當然不投入。」他強調香港在這方面沒有值得學習台灣的地方。（見3月31日《蘋果日報》報道）這些說法與實際並不相符，且是對台灣人民的侮辱，間接地也是對香港選民在過去以至將來踴躍參加投票大潑冷水，以貶低台灣普選來辯解香港的沒有民主。

中國人民（包括港、澳居民）將會從台灣的民主政治進步中得到啓發，為爭取應有的民主自由權利而汲取台灣民眾的有關經驗教訓，作為自己今後行動的指南。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立即停止壓制，釋放法輪功等異見者！

張開

壓制與反壓制的不間斷鬥爭

中國當局鎮壓法輪功與群眾反迫害鎮壓的鬥爭，像一根紅線般串通著近年來的中國政治史。從99年7月中旬大舉搜捕法輪功負責人、從而激起全國30個城市3萬名以上學員上街抗議之後，鬥爭就沒有停止過。

99年11月2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北京一次3千官員的大會上報告：僅在去年7月20日宣佈取締法輪功後，至10月30日之間，當局在北京就至少拘捕了3萬5千多名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這期間沒有一天安寧過。因此，他認為同法輪功的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複雜的。

同一天，北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將反法輪功鬥爭進行到底；認為這個鬥爭關乎黨的前途，如果低估鬥爭的嚴重性、複雜性，就要犯歷史性錯誤。（99年11月30日《星島日報》刊載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引述3個獨立消息來源的報道。）

國務院新聞局局長錢小芊在12月2日對4家記者解釋：「所謂『35,790名法輪功練習者』，可能指的是……在北京公共場所企圖搞非法聚集，被勸離或帶離現場的人次數。」（《文匯報》3日報道）這幾乎是承認了上引報道的真實性。

錢小芊同時透露，「法輪功大法研究會」的主要骨幹李昌（公安部電腦部門負責人）、王治文（鐵道部物資總公司工程師）、紀烈武（大陸駐港金屬公司總經理）、姚潔（北京一地產公司黨委辦公室主任）已被起訴。15日之後，法院宣佈不公開開庭而對他們分別判處了18年、16年、12年和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和組織、利用邪教組織致人死亡」。並且指稱：99年4月25日，「李昌等人組織煽動北京及外省市『法輪功』練習者萬餘人，到中南海周圍非法聚集，靜坐示威」。這就表明，他們只是聚集靜坐、和平請願，要求練功有合法性，事後卻被加上許多罪名加以鎮壓。隨後一段時間，據報道，北京每日都有近百人被扣留，未有一日

停止過。後來，黑龍江大慶市284人聯名給江澤民公開信，要求取消把法輪功定為邪教，並停止鎮壓它，結果其中6人被判勞教。

在大批的法輪功學員被拘禁期間，還受到諸般虐待、毆打，因此致死的至4月中已知至少有15人。有數以打計的學員在獄中絕食抗議。

許多被捕者都並非精神病人，卻被關進精神病院，當作精神病人對待。從99年12月初開始，有50名學員被無辜地送進北京周口店精神病院，心靈更受創傷。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女教官李群，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送進南京精神病院，並強迫服食損腦的藥物，為此她寫信託帶出外而加以強烈譴責。

不斷的拘捕、監禁，並沒有阻止法輪功學員不斷的上天安門廣場靜坐練功，甚至拉開橫額示威。在今年春節期間，便至少有500名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被公安拘捕。全國40個城市都發生集體練功事件，被拘人數在2千以上。春節過後，在大陸被判勞動教養的法輪功學員超過5千人，被短期拘留者超過1萬人，有300人被判刑。

在兩會期間，一邊是朱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聲言果斷處理法輪功邪教已取得重大勝利；另一邊，在天安門廣場，卻有40名法輪功學員示威，無懼於被拘禁。

儘管國家的鎮壓機器不斷加強打壓，但仍不能令中南海最高層滿意。《東方日報》在今年的「兩會」採訪組報道，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澤民在3月1日出席公檢法聯席會議，指公安、國安等保衛部門對法輪功監控不力，未能令中央放心。這使得警方要重新部署，進一步加強鎮壓。但也再次證明，「有壓迫就有反抗」，「壓力越大，抵抗力也越大」的規律，對統治者已構成巨大威脅。

4月13日，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美國動議譴責中國人權紀錄之前5天，數百名法輪功學員再到天安門廣場集體示威。他們分成6批在廣場不同地方同時舉起旗幟，高呼「法輪大法」，他們被公安拳打腳踢後押上車；但不多久，又各有5至10人組成的幾個小組舉起最少4幅橫額示威；他們在被推上車後還在

舉起橫額，至少有200人被載走。

在萬名法輪功學員中南海周圍靜坐將近一週年的那幾天，天安門廣場戒備特別加強，但每天仍有40、50名學員被公安帶走。新華社4月19日引述國務院新聞辦一負責人稱，現正進行的鎮壓法輪功行動，可說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鬥爭，法輪功成員每天都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他又說，天安門廣場公安於4月5日成功制止一名姓李的法輪功成員引爆縛在身上的炸彈。（4月20日《成報》報道）由此可見當局鎮壓所造成的憤怒反應既深且烈。而在今年兩會期間，天安門廣場上已經有一人引爆炸彈，造成一死一傷，官方稱自殺者曾4度上訪信訪辦公室申訴求助無結果，雖然他不一定是法輪功學員。

在「4·25」一週年的當天，北京市氣氛緊張，天安門廣場在如臨大敵的嚴密保安下，仍有百多名法輪功學員闖入，在清晨分成7、8人一組，進入後以靜坐練功方式進行抗議示威，又是在拳腳交加下，百多人被強行推上車帶走。

官方的理據

在當局殘酷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引起民間普遍不滿的時候，《人民日報》12月27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引述美、日等國政府鎮壓邪教的事例，以圖替中國當局辯護。但事實上，在所有法治的西方國家，都沒有一條法律是要完全取締所有「邪教」的。日本「奧姆真理教」只因在地鐵放毒氣造成12人死亡，和5千人受傷害，日本當局才對為首的主事者拘捕判刑，而對該教則監控3年，但對該教的信眾卻不加拘禁；美國在1993年出動軍警攻克「大衛教」總部，是因為該教派禁錮著一批婦孺，且帶備武裝，進行頑抗。而所有的犯罪者，都有其他的治罪法例根據具體犯罪而用那種法例來起訴。但中國的法輪功組織，尤其是其參加者，卻宣稱主要是為了修煉功法、強健身體的，其組織的宗旨也倡言「真、善、忍」，導人向善、和平忍讓。但他們一被公安發現在練功，無論是在公園或家中，都被拘捕，遭到嚴厲的打壓。

借口邪教害人而任意加以迫害，不能以理服人，只能造成人民更大的反感、對抗，製造更多的反對者，更加劇社會的不安、動盪。

其實，所謂「邪教」，其客觀標準是什麼，由誰來定其為「邪」抑為「善」的宗教呢？京官提出定它為邪教的理據之一，是它害死了1,400多名修煉者。但

那些人之死，是否真的完全因為修煉不得法，還是由於與修煉無關的死因呢？再從一般的體育運動（如跑步、舉重等）來看，都難免會有由於過份劇烈或伴隨其他如心臟病發而導致死亡，能否因此而取締某種體育運動，或對教練判處重刑呢？試看看那些修煉法輪功的人，他們靜坐著，緩慢地運動手腳，閉目凝神，心平氣和，又怎會因這樣而致死？這是無法令人置信的扣帽子手法。

另一「理據」是其領導人李洪志們，靠售賣書籍等手法詐斂錢財。但其他的「愛國」宗教教會，不是向來都有出售書刊等同樣的商業行為嗎？而且，幾乎所有的教會都變相地迫使信眾大事捐獻；而法輪功的刊物則宣稱，他們的「所有學員義務教功，不求名利，不收錢財，分文不取」的。

法輪功學員的解說

從另一方面，即與北京官方所指責的相反方面看，法輪功從1992年提倡後，不到10年即發展得很迅速、龐大，在全中國及世界各地都有無數的學員在修煉。為什麼有這樣快的發展？據《法輪大法簡介》這份傳單解說：

「法輪修煉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煉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

「法輪大法不是宗教。他直指人心，明確修煉心性才是長功的關鍵，心性多高功多高。……學者在心性提高的同時，輔助以煉功，短時間內身體就會淨化，達到無病的狀態。

「據最近一份北京市對約一萬三千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的健身功效的調查統計報告顯示：93%的人煉功前有病，煉功後祛病健身效果總有效率達到99%，其中近六成的人完全康復。廣州市也得出了相似的調查結果。煉法輪功確實令到許許多多人的身心感受頗深。法輪功在幫助修煉者強身健體、開智開慧的同時，更要求真修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標準，由好人做起，從而亦促進了社會風氣的改善和道德水準的回昇。」

另一份名為《高德大法「法輪功」》（1999年4月第一期），載有同年1月1日由廣東省22名教授等「簽名人」（附有姓名及其簡歷）的文章《我們為什麼修煉法輪大法》，其中指稱：

「我們是高等學校、科研單位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和黨政軍部門中離退休的老同志，先後走上了法輪大

法的修煉道路。我們是在思想上經歷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過程之後，才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最初，我們也有著對宇宙、人生、氣功、疾病等方方面面的疑問，對人體修煉也是一無所知，對當今科學知識範疇以外的更高更大之理更是聞所未聞。但是我們通過系統地聽了李洪志老師的講法或者系統地自學了《轉法輪》，……使我們逐步走出了障礙人類正確認識自己和宇宙的迷霧，如同在探尋摸索中找到了路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我們認準法輪大法不是迷信和玄學，而是真正的科學、更高的科學，是因為我們是實踐者和受益者，有共同的體會，事實給了我們的發言權；同時全球範圍內有上億名修煉者的實踐，大面積出現的超常科學現象和利國利民的社會效果，是經得起任何國家、組織特別是科學的調查和檢驗的。……」

封殺氣功組織和煉功

除廣東省以外，在中國各地也有許多高級知識份子、離退休幹部修煉法輪功，他們有不少因堅持不肯認錯而遭判刑。除了前面提及的例子之外，還有近來見於報章的人物。例如：74歲退休空軍指揮學院教授、正軍級（相當於省部級）將領于長新，因支持法輪功，於1月6日被重判入獄17年；他在70年代，曾努力研究及解決空軍安全駕駛問題，作出過重大貢獻。

中外有名的國家體育運動總局局長伍紹祖，在法輪功、中功等氣功組織被禁之前，據報道也曾經支持它們，嘗試代表它們進行遊說。他在4月19日被宣佈撤去其原有職位。伍紹祖以他對體育運動的專業知識，確信法輪功、中功等實為有益的氣功運動，不應加以禁止。這是另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當局的禁令是無理由的。

在中南海周圍萬人靜坐之前不久，這些氣功活動是可以公開合法地進行的；李洪志等的書刊，也可在各大書店中售賣。但在「4·25」之後幾天，當局開始鎮壓，首先禁止黨政官員練法輪功；7月20日宣佈法輪功為非法組織；到10月15日再升級改定它為邪教，半月後由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嚴厲懲治邪教的決定。這樣地經過將近3個月才升級為邪教，並非由於當局對法輪功多年來的一切情況不清楚，認識不足夠（實際上當局是完全掌握得一清二楚的）；而是由於

要套上更嚴重的罪名，才能施以重刑懲罰，企圖藉此鎮壓住法輪功學員的頑抗。從當局這樣的改變，亦說明了它所用的罪名是隨政治需要而定的。

此外，目前又已有15個宗教團體被定性為邪教，包括中華福音團契、新約教會、全範圍教派、門徒會等14個依據聖經組成的教團，和一個佛教的「觀音法門」，它們的總人數估計有5百萬之眾。

差不多同時，當局對「中華養生益智功」（簡稱「中功」）也宣佈它為「非法組織」，禁止其成員練功。該組織號稱有3,800萬成員。它在今年3月向全國人大致送的公開呼籲信中表示：「中功」的3千個機構都是合法向政府領有工商營業牌照，但去年十月中央一聲令下要各地收回「中功」機構的全部營業執照。中國號稱「以法治國」，但當局一聲令下，3千個合法經營的企業機構就被關閉，機構擁有的巨額資產也被沒收，這種做法完全無視憲法。公開信呼籲人大代表正視黨的領導人的權力永遠高於憲法及法律的現實，督促政府立即收回查封3千中功工作機構的決定，給予40萬員工及家屬以生存權。公開信也強烈呼籲釋放前北京人大代表嚴嬋娟在內的600名中功領導人，保證公民的人身自由。

其他據稱擁有幾千萬成員的各類氣功組織，例如「中國自然特異功研究會」（簡稱「國功」）也被取締，有的組織則至少遭到嚴格限制，不准出版有關書籍及公開練功等。實際上，中國的氣功研究源遠流長，非常多的人都學氣功以強身，各種氣功團體因不同的練功方法而成立，達2千個之多。他們並不涉及政治。但當局在取締法輪功的同時，卻要一起打壓民間的氣功等組織，以阻遏其存在，免致威脅中共統治的穩定。

打壓擴展到各方面

除了上述的打壓、取締外，其他的民間組織也同樣遭到打壓，被宣佈為「非法」，禁止其存在、活動。據北京市民政局局長劉寶成透露：截至99年11月底，北京共發現「非法民間組織」80個，比98年增長42%，其中62.5%的組織危害國家利益，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經濟秩序。而自86年起的13年內，共查處非法民間組織467個。這些組織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重大隱患，危害極大，必須依法查處。（今年1月17日《明報》）上述的數字，還只是北京市「查處」的。

當局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方面的打壓也同樣毫不手軟。中國民主黨成員繼續被迫害，許多人又被判重刑；去年12月開始創辦的《中國文化復興通訊》，志向只在促進文化、思想、宗教自由」的，其4位負責人熊晉仁、陳蔚、胡俊、王一梁也在今年1月被捕，可能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刑。

近兩月來，一些著名不同意見者也紛紛被判刑。例如，一位馬姓詩人，又被加上「顛覆煽動罪」而判處入獄5年，他僅僅是試圖在97年8月，與一批作家、藝術家共同發起文化復興運動，期望把受到官方思想箝制的作家解放開來，便被拘捕及判刑了。在1986年，他也曾在北京參加學生示威活動而入獄3年。

河南的著名人士安均，近日也被扣上「煽動顛覆政權」罪，判刑4年；他在98年初成立民間反腐敗組織「中國腐敗行為觀察」，發展到300成員，其中包括有解放軍，卻因此而被捕。

在北京的學術界內，又一次刮起烈風，中宣部對鼓吹「自由化」的4名學者李慎之、茅于軾、樊綱和劉軍寧進行批判，其中原任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長期倡導自由主義的劉軍寧已於3月被迫離職，賦閒在家；樊綱原為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同社科院前研究員茅于軾長期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為改革開放提出過不少意見。這一股政治寒流的吹襲，使思想較為開放的學者人人自危。

必須立即停止迫害，釋放被捕人士

這許多大大加強的封殺、取締、鎮壓、拘捕、判刑，實際上是濫加罪名，完全違反了現行憲法所規定的中國公民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思想、宗教信仰、和平示威、人身保護等自由權利，是中國人權的又一步大倒退，必須遭到譴責、反對的。

中共之如此加強鎮壓，不是表現它對統治穩定的充滿信心，反而是反映高層領導人的缺乏自信，色厲而內怯，外強而中弱，甚至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害怕稍加放鬆控制，便會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心理，反映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的如下講話中：羅幹指出，從當前的情況看，今年公安工作面臨的形勢仍然錯綜複雜，任務十分繁重、艱巨。全國公安機關要充份發揮職能作用，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政治穩定。要始終把維護穩定作為公安工作的頭等大事來抓……。對繼續組織、策劃、參與「上訪」、聚

集等非法活動的骨幹份子和頑固份子，要依法查處，嚴防其死灰復燃。

江澤民是最高的發號司令者。今年2月23日《東方日報》的中國組記者自北京報道：「據消息人士透露，為了挽救黨內日益嚴重的『信仰危機』，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南巡前，專門聽取了中央『六一〇』辦公室關於處理『法輪功』的工作匯報。江澤民要求今年『兩會』前要統一思想，清除『法輪功』的影響。並強調要重視那些陷入『法輪功』的高層知識份子的思想轉化工作。……」使「法輪功」的影響減到最低點，至少在高級知識份子中間最大限度地消除影響。因為「法輪功」在民間的影響甚廣，練習者甚至十分執著，因此他們的轉化不可指望在短期內畢其功於一役。

「據悉，江澤民在給政治局常委的信中談到，千萬不能放鬆思想政治工作。大家對思想領域和各方面可能出現的傾向性問題，要保持高度政治敏銳性和警惕性。

「江澤民承認，黨內一些人『精神空虛』，出現『信仰危機』。

「江澤民其後南巡廣東時，更大力推動整黨，在縣（市）一級黨政官員進行『三講』教育，將『講政治』當作首要任務。」

上引的話，也反映江澤民內心的不安，企圖藉高度鎮壓來穩定局面。

筆者在99年7月28日，當中共宣佈取締法輪功之後幾天，曾為文評論這一鎮壓的原因和結果，其中指出：「可以相信的是，統治者這種強力鎮壓手段並不能解決思想政治上的危機問題，不能以理服人，反而會增加人民，尤其是被封殺者的不滿和怨憤，把大量的修煉者推到中共的對立面，變成新的敵對者（縱然不公開顯露出來），許多修煉者將從公開轉到地下活動，並且會為將來爆發的民間抗爭增添一股新的力量。這是中共不斷為自己製造敵人的又一新事例。」（詳見《十月評論》99年第3期）

從上述的事實和評析可以說明：所有在近年來被打壓、拘禁、迫害的人民，都是官僚政治中的無辜受害者。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應該同情、聲援他們迫使中共立即無條件地釋放他們（包括不同思想、宗教信仰的異議者、政治犯），並恢復他們原有的職位、工作和名譽。

2000年4月28日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帝國主義廣開門戶

《工人先鋒報》

「世界貿易組織99年底在西雅圖召開高峰會議前夕，美國和中國簽訂了一份協議，結束了13年來美中的外交談判拉鋸戰，為中國進入世貿組織鋪平道路；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此舉是他任內達成的最重大的外交成就。而在中國和國際間，人們視這項協議是中共總書記及國家主席江澤民、中國總理朱鎔基領導下的「改革派」得到的重大的政治勝利。

中國之加入世貿組織，將會是意味到把仍然由國家壟斷控制的對外貿易權撤除掉。該項美中協議，是中共繼1997年決定售賣大量國營企業後的一個步驟。江澤民及朱鎔基一夥旨在運用對外貿易激烈競爭的壓力，以加快國內私有化的步伐。

根據美中協議，外資公司今後將可以擁有戰略性經濟部門如電訊業高達50%的所有權。目前用以保護國營企業的特惠稅率將受大幅削減，由此而估計將導至汽車業喪失50萬個職位，鋼鐵業喪失3分1的職位。同樣，在農業方面也將大幅削減進口稅率，估計成百萬千萬的農民將要被迫加入流動人口的行列。

不過，這項世貿組織協議並不能夠完全左右大局。中國無產階級當下最迫切的課題，倒是起而保衛1949年革命取得的革命成果；這些成果現時已經被大肆侵害，大為減少。

就在協議簽訂的短短一周後，12月1日的《南華早報》便有報道：「在西安、重慶、衡陽、北京和長沙，據報出現有靜坐、示威和破壞鐵路線的事情發生。」甚至退役軍人出來抗議，要求獲得應有的就業安排。

帝國主義資本家及其發言人明白到，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首先就要打破中國工人階級的抵抗。中國建設銀行和華爾街巨人摩根·士丹利組成的聯營企業的研究所負責人徐肖恩（Shawn Xu，音譯）便指中國之加入世貿組織，是「自中國20年前推行經濟改革以來意義最重大的一個舉動。」不過，國際金融家及其中國代理人的歡欣情緒，也由於害怕中國出現社會動蕩，尤其是勞工動蕩而蒙上不安。簽署協議之後數日，《紐約時報》報道，北京紡織廠一名職工尖刻地聲稱，「將會有更多工人被解僱了」。這則報道提出警告說：「中國有上百萬、千萬人具有這恐懼和憤怒，成為中國百上加斤的最巨大的挑戰之一。」

美國官方工會小罵大幫忙

與此同時，在美國，親帝國主義的「美國勞聯產聯」的工會官僚，也加入右翼資產階級的大合唱，謂克林頓在與中國達成加入世貿組織協議這件事情上，「出賣」了美國利益。去年底在美國西雅圖進行的反對世貿組織的抗議浪潮，其中的一個焦點，就是「美國勞聯產聯」上層進行的反對共產主義中國的宣傳。這種反共宣傳，就以美國聯合鋼鐵業工人在碼頭表演「傾倒」中國鋼鐵為特點。

華盛頓一方面宣揚中國那些異議分子如魏京生和「勞工組織者」韓東方，一方面則加緊實力以對付中國，例如在最近提出設立亞洲區的「導彈防衛區域」系統，這項提議並且還可能把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包攬進去。諸如這些計劃，與美國之與中共「締結盟約」並不是兩碼子事。美國各派資產階級在對付中國的目的上是團結一致的：要推翻1949年革命，收復對剝削中國大地上的工人階級的「權利」。

中國除面臨外來帝國主義的壓力，還備受海外強有力的華人資產階級的壓力；這些華人資本家主要集中在台灣和香港，並且分佈在東南亞一帶。俄國十月革命把國內資產階級打敗。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則可以在1940年代逃離中國大陸，在海外保持與大陸的親族連繫。華人資本家在香港有著強大的力量，他們擔任中共官僚及其子女們的電導體，幫助他們發財致富。至於台灣，則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的威脅，它作為帝國主義向中國施以軍事壓力的基地，並且是向中國投以大量資金的主要泉源。

中共自1992年重新推進資本主義復辟的步伐，隨著中國之加入世貿組織而會進一步加速。自1997年後，主要的國營企業已經轉變成股份制公司，由政府持有大量股份。現在，政權容許把部份這些政府股份售予私人擁有。1999年11月24日的《南華早報》報道，「北京有意引進嚴格的承繼權，其中一個用意是限制方興未艾的私人企業家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力。」中國在資本主義「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有多遠，這可以從實行繼承稅方面略見一斑。

中共首腦江澤民之子是中國最成功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之一；朱鎔基之子是摩根·士丹利聯營投資銀行

的行政人員。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希望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後代能置身於中國新生的剝削者行列之中。托洛茨基早在1936年寫的《被背叛的革命》裡，對蘇聯斯大林派官僚層作出決定性的分析中，刻劃了這種發展：

要是他們不能夠把特權傳授給子女，這些特權便只有一半的價值。然而遺囑的權利和財產權利不可分割。單是成為托勒斯的總裁是不足夠的，必需要成為一個股份持有人。官僚在這個決定性的領域取得勝利，將意味到它之轉化成爲一個新的佔有階級。反過來說，無產階級對官僚的勝利，將會確保社會主義革命重新恢復生氣。

托洛茨基向蘇維埃社會提出了一個必需的抉擇——而這個提問，對今日的中國具有著迫切性：「官僚將把工人國家一口吞下，還是工人階級將把官僚掃蕩一清？」蘇聯無產階級長期受到斯大林派的民族主義所毒害，備受背叛和欺騙，在葉利欽於1991年8月奪權的時候，便無力起來制止這場反革命。

雖然中國的官僚宣明要全面推行市場經濟，但國營經濟迄今仍佔全國經濟的40%，在1999年10月7日，即美中簽訂加入世貿組織協議之前，《遠東經濟評論》表示：「正是由於國營企業傳統上發揮著就業和社會福利的關鍵作用，北京才不願過速解散國營企業，北京害怕把成百萬千萬的人趕出工作崗位會造成政壇動蕩和社會動蕩的結果。」這就像托洛茨基在論及斯大林政權所言，官僚之「繼續保存國有財產的程度，只和它之害怕無產階級的程度相同。」

女性是市場化最大受害者

北京的斯大林主義者推行資本主義復辟的程度，確是比起1980年代末期的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日益把中國社會的各個部份驅上赤貧之路。上千萬計的農民破產，農村青年生計無著，只得蜂湧入城市找尋工作。但城市工作難求，許多流民（估計在北京一地，就有二百萬流民）無家可歸，淪爲乞丐，或當娼維生。即使官方的計劃預測也測定，在臨達2006年之時，無業或「不充分就業」的人民，將佔就業人口20%。而據其他估計，中國當前的失業人數已經高達20%。喪失職業的人，也同時一併失掉房屋、醫療、教育和退休等福利，因為這些福利是和國營企業聯繫在一起。

打破鐵飯碗的過程中，女性和老年人受害最大。在國營企業全部受解僱的員工裡，女性佔了3分2之強。由於提早解僱，她們的退休金也因而減少。在貧

困的農村，無力負擔教育費的家庭，通常都讓女兒輟學。隨著農村經濟回復到家庭耕作的經濟方式，及隨之而至的反動態度，令女性之受教育被視爲毫無價值。另一方面，在1949年革命前盛行拐賣婦女的狀況，則是死灰復燃。被拐帶的婦女被賣作他人「妻子」。老人的處境亦同樣不妙。隨著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制度日益瓦解，他們的生活也日益困難。

繼承關稅及貿易總協議而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是後蘇聯時代的「新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其主旨是爲對第三世界進行毫無節制的剝削，開出「新自由派」政策的配方，爲美國、西歐、日本和金融家服務。

在美國，主張經濟民族主義的右派，以至有些左派，通常把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看成是一個全球性的強大組織，爲各個會員國訂立規章法律。在現實裡，世貿組織、「國基會」和「世界銀行」等一類國際性的機關，是由美國、西歐和日本這些帝國主義大國根據各自的利益而制訂協議的。一旦這些國家的本國利益佔了上風，從而各自競逐剝削範圍，這些協議便會不吹自破。中國在這場競逐賽中是一頭肥美的金鵝。帝國主義的投資令反革命在中國不會爲國家帶來豐盛的經濟發展，反而會使國家成爲列強拼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場地。

帝國主義者們著眼於由北京官僚從上而下帶頭推動的資本主義復辟；而在另一邊廂，美國有部份資產階級則在仿製1980年代向蘇聯發動第二次冷戰的攻勢，鼓吹用打經濟戰和施加軍事壓力這條路同時前進。在今天鼓吹對中國發動冷戰攻勢的勢力，包括有親民主黨的工會官僚及右翼共和黨人。

向中國發動冷戰攻勢

「美國勞聯——產聯」首腦約翰·斯威尼在1999年11月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說，克林頓政府向中國屈求的一宗交易，把人權看作可以隨手丟棄的滋擾物看待。」「美國勞聯——產聯」把與中國對敵的反共立場與旗幟鮮明的貿易保護主義兩相結合起來，聲稱要「挽救美國人的職位」。這種反對中國（或日本）進口產品的煽動性論調，毫無例外的一律強烈帶有反對「黃禍」式的種族主義的潛台詞。「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上層在1970年代反對日本進口車時所煽起的排亞洲人種的歇斯底里情緒，在1982年直接地導致了美國底特律市一所夜總會外發生的一宗謀殺案：兩名種族主義者——其中一人是佳士拿汽車廠的工頭——謀殺了一名美國華人。在今天，工會上

層發表的反共、貿易保護主義的激烈言詞，直接地在所謂李文和間諜案挑起的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的惡意氛圍中火上加油。斯威尼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發言，同時又裝作關心中國的工人。他說，在中國，「任何個人企圖組織工會，便會立即被捕收監。」

美國工會官僚對中國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人的權利和利益不屑一顧。「美國勞聯——產聯」的官僚與美國政府保持緊密合作，在拉丁美洲和亞洲扶助反勞工的軍事政權上台，並且在東歐和前蘇聯鼓吹資本主義反革命方面起了十分主要的作用。

在1950年代韓戰和1960-70年代的越戰中，「美國勞聯——產聯」的上層是最狂熱的「鷹派」之一。在第三世界大部份國家裡，人們把美國這個勞工組織看為是「美國勞聯產聯——中央情報局」。

中國工人比起東歐和蘇聯工人在面臨反革命之時

更有先見，他們中許多人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市場的殘酷效應。這種發展將對中國社會的鬥爭動力及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產生影響。廣泛的勞工罷工的矛頭之一，將會是指向外資公司和聯營公司。但這不表示中國工人是對西方「民主」的幻想免疫。不過，他們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幻想及融入帝國主義全球經濟體系中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之幻想，是要低得多的。在1980年代，華里沙的團結工會要求波蘭加入「國基會」；而在現時的中國，幾乎所有報道都顯示工人對加入世貿組織是憂心忡忡。

中國倒退回資本主義奴役的危險是越來越緊急了。動員中國無產階級起而保衛集體化經濟及中國革命的其他社會成果，具有急迫的需要。可是，唯有具備一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和前景，才可以給這場鬥爭帶來勝利。

（史丹摘譯自《工人先鋒報》1999年12月10日）

中國政府承認有三億貧民

史丹輯譯

當特別甄選出來的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之際，全中國有3億人口活在貧窮的忧愁之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目前正和中國政府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緊密合作。婦女和兒童受害最大。中國目前仍然存有著拐賣人口的問題；據估計，每年有1萬人被拐賣。

縱然農村常被說成是如何如何的發達，實際的圖象卻是，農村的不平等與時俱增。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重要的福利和社會服務日趨崩潰。專家說，農村的醫療制度正在分崩離析，鄉村醫療人員經常不獲發薪；至於在城市，醫療人員經常只收到正常薪金的3分2。醫生們為了彌補薪金差額，幹著各種各樣不正當的勾當。

在許多貧窮地區，其所得的教育經費，往往只足抵償教師的薪酬和校舍的開支。人口較多的家庭，鑑於不能負擔書本及其他開支，乾脆讓子女停學。

為引進外資而創造條件容或使一部人致富，但卻把許多人驅入貧窮。政府宣稱，在過去5年間，成功的使赤貧人口減半。不過人們有多樣的理由對官方的統計數字不持信任，因為地方官員出於許多理由或會把這些統計數字扭曲。

在大量設立有外資工廠、高速發展起來的城市，無疑是滋生貧困的溫床。在這些地方，工資按西方的標準是很低的，而福利及社會建設卻是遠遠不能配合人口的動態，其緩慢程度很令人不滿。

政府其中的一個優先項目，是保證讓全國半數農村家庭在公元2005年之時，享有適當的衛生設施。所謂「適當」者，不是指在地方最惡劣的貧民窟所可見的水廁和排污系統，而卻是指回復到有適當處理的地廁，在其下面積存著糞便。

離開集體農場之途，顯然的導致更多使用工業化肥，而不是經處理過的人糞。「新」地廁將僅僅是令人糞隔開，使之不會成為蚊蟲滋生的溫床。

在中國，有時爆發的政治鼓動和暴亂，是社會緊張日益加劇的外部表現。長遠來看，統治中國的官僚是無法避免與廣大群眾爆發公開的衝突的。

中國政府當然是不得不尋找通向世界市場的途徑。就像北韓以不菲的代價發現，她是不可與世界其他地方長期在經濟上孤立隔絕的。只不過，資本的入侵同時也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矛盾一併注入來，這是連最富希望的「形成中的市場」的中國也無可倖免。

西雅圖「反世貿組織」運動內望

拉文德

「反世貿組織運動」去年底在美國西雅圖贏了一場戰役。這只是一次插話性的勝利嗎？它可以為將來的群眾動員提供一個模式嗎？這些問題，部份有賴於我們怎樣汲取該場運動的教訓。一個囊括了勞工運動、社會運動、環保運動和勞工化中的年青人，具有群眾性和多重性潛力的國際性抵抗運動，端是令人振奮。可不過，有許多的政治陷阱，足以把這種潛力堵塞。

西雅圖一役之勝利，部份是由於我們這邊廂的陣營有相當的匯聚和興趣，部份是由於帝國主義陣營間的團結有相當的破裂而致。然而上述的所有條件並不是確保不變的。

脆弱的聯盟

綜觀有關對西雅圖一役的論說，一般分成兩類。最廣為眾論的看法，大部份出自勞工運動、改良主義流派和民間社會的傾向。他們往往把西雅圖運動中存有的政治歧見和衝突說得輕描淡寫，把矛盾淡化。而另有較為少數的一派，反為把政治分歧和種種問題大描特描，將差異放到前面。

一些小型左派組織對整場反世貿運動的政見和動員，採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從而令自己處在孤立的邊緣。而在直接行動的激進運動裡，則是流於對勞工、勞工領袖和改良主義力量的作用持有負面的評價。他們的一些批評儘管正確，但這對於如何建立團結行動無補於事，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如何在行動中去團結而鬥爭。

西雅圖運動在總體來說是進了一步，這由包括來自勞工運動方面的、規模相當大的群眾動員突顯出來。整個西雅圖反世貿組織行動裡，由「美國勞聯產聯」領導的遊行隊伍為數約有4萬人，而其他各類行動則有約1萬人參與，其中青年人佔了壓倒性的數量。整個西雅圖行動來自要求「公平貿易」和「反對世貿組織」兩方面的力量，兩者有著形式鬆散但保持一定程度的團結。可不過，這種團結每每是由政治含

糊又或是對政治分歧隱而不宣而達致的。

勞工運動的二重角色

在長達一周的抗議行動裡，有組織勞工的參與令這個運動添了一定的階級屬性。但有一些激進青年卻認為，勞工在行動裡是過分的節制和沉悶。不過，有成千上萬工人在工作天就政策問題站出來抗議，可也不是尋常的事啊——這支抗議大軍就足有3萬人眾。只不過，工人的抗議並非通過集體罷工來表達，只有一個例外：美國碼頭裝卸工人工會舉行了一天抗議罷工，令美國西岸海港癱瘓一天。

問題是在勞工政治，或準確的說，是「美國勞聯產聯」領導層的官僚的政治發生問題。譬如，該會主席斯威尼在世貿組織會議召開之前，便已經表態支持克林頓的貿易政策。有份參與和組織西雅圖勞工抗議遊行行動的其他工會領袖和工人，不一定就贊成「美國勞聯產聯」領導層的立場，只不過，在遊行當天，大隊亦沒有和它劃清界線。

勞工的戰術看來具有著二重性。一方面，它這次作了真實的動員，以保衛工人的利益，反對由不公平貿易和跨國公司帶領的全球化對工人的職位、生活所造成的威脅。遊行反映了工人基層，尤其是產業工人的不滿。但在另一方面，遊行的方向，是要向民主黨施壓力，要求民主黨採納對勞工有利的貿易政策；與此同時，工會的官方路線是傾全力以支持民主黨繼續執政。

就怎樣保衛工人職位方面，行動的一般取態是公平貿易，包括要求在貿易協議中加入最低工資的條款，成為世貿組織規條的一部份。

就此克林頓政府是樂意聽取的，它大概還會借之而把不附從公平貿易規定的國家的某些進口貨品拒諸美國門外呢。只不過，克林頓政府這些主意遇到了南方國家的冷待。在南方國家看來，克林頓政府只不過是藉詞把貿易條件更加收緊，令它們的負擔更加沉重吧了。來自南方國家的活躍分子對於美帝國主義自把

自為的包攬貿易條件、隨己所欲地指指點點深感不滿。他們認為，美帝主宰的貿易條件儘管或可會改善美國工人的生活狀況，但卻不會改善世界上大部份貧苦兼無組織的人民的生活狀況。

國際性的勞工標準是一個可為的目標，但是在國際間的工人運動和民眾運動欠缺一個公正的權力關係的條件下來將之推行，則會受到利用，驅使不同國家的工人互相競爭、互相反對。

在西雅圖行動裡，美國勞工界無疑是有點兒經濟民族主義的潛台詞，例如鋼鐵工人打出的遊行口號是這樣：「不公平貿易毀掉美國職位」。范丹娜·施娃在勞工及環保分子的聯合集會上便指出，有些人把問題搞錯了，譬如鋼鐵工人的口號應該改寫成「不公平貿易毀掉人民的生活」。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國勞聯產聯」領導層在11月30日當天的行動。在鬥爭焦點的當天，「直接行動」在早上7時已經有所行動，並導致警察放射催淚彈及使用其他暴力。但「美國勞聯產聯」的示威遊行卻選在午間1時30分，於遠離世貿組織舉行會議的城中心地點進行。這個作法，又怎能回應早上發生的事件呢？

抗議聲音多樣化

在這支勞工遊行隊伍裡，共有1,000名糾察，而且沒有企圖邀請其他人參與進來一起作決定。（稍後，我聞說「美國勞聯產聯」原訂於會議地點外遊行的牌照被吊銷。他們就進行地點舉行了內部會議，最後是主張遠離「直接行動」範圍的意見得勝了。結果哩，就是這支遊行隊伍在事實上和象徵意義上分道揚鑣。在糾察的指導下，遊行隊伍偏離鬥爭重地愈遠；不過，也另有一支上千人的小隊（主要是非工會人士及小部份勞工人士）用腳進行了投票，自動地操向抗議中心。

「美國勞聯產聯」的領導層本來是有機會在政治上和戰術上作出領導的，但它卻沒有擔起重任。這個政治和戰術的真空，結果是由其他力量填補了。

在世貿組織會議揭幕之前，示威人士舉行了一系列的講座和會議。最重要的活動是由「關注全球化國際論壇」組織的大型會議，共售罄了2,500張門票，讓許多人不得其門而進。講者有各方知名人士如范丹

娜·施娃、蘇珊·喬治、華爾登·貝奴等人。

就關於人們對另類出路感到無望這點，知識分子所作的批判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且爭取到廣泛聆聽。但這個會議也不是無可非議的。它太側重於明星制度，而且是在一個大型演奏廳舉行，這與戶外英勇鬥爭的情味實在大相逕庭，令人不是滋味。至於會議所主張的政治，儘管是有些受到一點兒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運動、生態運動的影響，但畢竟不是明擺著左派。而來自左派的聲音——來自基層的社會主義者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激進無政府主義者，乾脆就沒有。

此外，也有其他大型活動，例如有很多人參與的，由12,000人組成的人牆遊行，要求取消貧國的負債。

西雅圖運動標示了運動的興起。可是卻沒有多少左翼社會主義者臨場參與。一方面，這是由於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近年大幅萎縮，相應於其他運動，其規模遠遠不及。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些團體的估計不足，料不到反對世貿組織及反全球化運動的潛力是這麼巨大，從而沒有把這項工作放在首位。還有的，就是一些團體的政治方向出現問題。

有一些左派把來到西雅圖街頭抗議的人稱為保護主義者，美國大國沙文主義者。而另有一些團體，雖然是來到了示威現場，但卻是止於宣傳，長篇大論這個運動如何的不正確云云。

組織這次抗議的最大主力是勞工，其次是生態運動，只是後者沒有那麼觸目而已。與拉爾夫·納達有關係的「公共公民」團體早在抗議行動一年之前便已經著手進行聯線聯絡，在事前組織方面發揮了意義重大的作用。另外，一些主流團體如「塞拉會所」（Sierra Club）也相當活躍。

在西雅圖，溫和地反對大公司、擁護公眾利益的綠色左派政治似乎頗得人心。拉爾夫·納達要是站出來為綠黨競選總統，當可填補這方面的真空。

「直接行動」網絡

人們注意西雅圖11月30日大行動和警察暴力之時，往往忽略了之前長達1年的籌組發動期。而這是這次抗議行動成功的要素之一。1999年春天，直接行動網絡成立了。這個網絡的基本取態是非暴力的公

民抗爭行動（由諸如的美國的加州為基地的「爭辯學會」（Ruckus Society）擔任習訓，並且特別鼓吹各種文化抗議方式，例如用街頭劇和大型木偶等表現手法（例如以三藩市為基地的「藝術與革命」劇團）。就是這些元素，結合著隨時參與以進行教育及行動的取向，吸引了青少年的參加。

就在西雅圖其時，那些無法在勞工隊伍和大型研討會會場找到一席位的青少年人，紛紛湧向「直接行動」中心。該處便自自然然的成了自治組織的重鎮。當我到這個中心參觀時，該處約有500名青少年，十分擠擁（就在世貿組織正式會期之前的1周裡，大約有數千名青少年來過這個中心）。年青女子的參與十分觸目。可不過，所有青少年人大部份都是白人，有色人種很少。青少年們看來貧困，似乎都是處在經濟邊緣，儘管他們的階級背景或許有異。

在現場，即時進行了各種各樣的預備工作。「藝術與革命」籌辦了一支多達4,000人而又絢麗奪目的街頭巡行，這個活動名為「回討街頭」。另外，大家籌辦的活動重點，是在11月30日大行動中令世貿組織會議癱瘓。

「直接行動」的政見清楚可見是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我會將之稱為是無政府一多元主義，而不是無政府一教條主義。落實在態度上，是來者不拒，歡迎共同組織及行動，沒有思想檢查。組織的工作主要是在小規模親密團體的基礎上進行，而較大群人眾則是在共同的行動上合作。而這之間的協調工作及有關的討論，則是由某親密小團體選派的代表們共同舉行的公開會議上進行；至於這些代表，則可以隨時撤換（這是採用了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模式）。

「直接行動」網絡對11月30日大行動的規劃是高度分散的。按設計，圍繞著會議場地的13處交匯地段將被人群封鎖切斷，而這13堆人只有鬆散的協調和交流通訊，決然沒有工會遊行隊伍那樣的糾察。

行動高潮堅守非暴力

在11月30日當天一整天，「直接行動」網絡各個示威駐點之間，以至全體在場示威人士之間的通訊和黏合力，似乎是與時俱減。就在我所在的示威駐點，約有500-1,000人，大家手挽手以圖阻止世貿組織的與會代表離開他們下榻的酒店。我方行動的守則

十分清楚，就是堅持非暴力，包括不破壞公私財產。警方最初抱持消極對抗的態度，或只是消極察看。然後他們發出突如其來的攻擊，發放催淚氣，胡椒噴霧，乃至揮動棍棒。漸漸便有小數人回擊，如擲回催淚氣的空罐。稍後，更有人推翻垃圾箱縱火。到午間我前往加入工會大遊行之時，警方已不能奪回對街頭的控制權。

後來，從工會遊行隊伍裡脫隊前來示威駐點的人群，已感到無所適從。我看到，其中一個示威駐點（約有1,000人）已經有人按捺不住，有一小撮人已經開始破壞一間名牌鞋店的招牌。人群中多數人立即大喊「不要暴力」，但卻也有小撮擁護破壞行動的人立即回罵。我覺得，很有可能是有一些便探喬充示威者來破壞公私財產的。另一方面，警方對這些行動是垂手不顧，全不理會。

到下午3時，西雅圖市長宣佈緊急狀態；到6時，宣佈城中心地區戒嚴。一些「直接行動」網絡的朋友企圖組織有組織性的撤離。在當夜，召開了一個有500人出席的公開會議，贊成及反對破壞財物的人爭個不休，但大夥決定翌日再度遊行。

不過，到了第二天，力量關係已經變化。「直接行動」失去了廣泛支持，人數大為萎縮。同時，政府出動國民警衛軍和警察，又採取堅壁清野手法，大舉拘捕了500人。

警察的行動受到普遍的責難，對被捕者的支持使警方在一周內陸續把示威者釋放，最後只有約40人被起訴。不過，公共輿論也普遍分裂。克林頓把示威者強分為「好」示威者和「壞」示威者，並且把示威駐點上手挽手封鎖會場的示威者也歸為非法示威者一類。美國的資產階級報章更把無政府主義等同於暴力。克林頓的戰略，很清楚是要把運動中激進的一翼孤立開來。至於那些與民主黨有關係，或是具有法理的部份，則是用懷柔政策汲納之。

這次世貿組織會議，動用了前所未見的懷柔手法，取悅非政府組織：有770名官方指定的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臨場被邀請與世貿組織官員會面。對「美國勞聯產聯」的官僚已經擺出了強烈的邀請，以圖令他們貼貼服服。對於幻想可以參加進去以改變制度的團體和人士，肯定是會再進一步作出這種邀請的。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2月號）

工人是歷史的動力

——回顧20世紀的經驗教訓

哈爾曼

在許多歷史學家看來，20世紀是西方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是戰爭與屠殺的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暴力的世紀。

20世紀的歷史，是規模最大的野蠻史。幾千萬人在兩次大戰中死掉，在納粹集中營死掉，在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群島死掉，在越戰、在橫掃非洲、高加索、中美洲和巴爾幹半島的內戰中死掉。歷史學家之間或許要爭辯，20世紀在絕對的幅度上是否最爲暴力的一個世紀。

但其中最爲可惜的卻是，20世紀雖是人類史上物質上最豐盛的一個世紀，應該能讓每個人過上更爲美好的生活，本來可以不患飢餓、不患病痛。廣泛的機械化令人類有機會脫離擔負了上萬年的苦役。可是，在這個世紀裡，人們看到技術被用作空前大規模的殺戮等等滅絕人性的兇殘行動。

活在1890年代的人，不曾想過事情會是這樣。對進步的崇拜掛帥，甚至也影響到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從伯恩斯坦與羅莎·盧森堡就改良還是革命所進行的大辯論裡，可見一斑。

伯恩斯坦相信，由資本主義驅動的技術革命，將會令人類生活有改善，以致令資本主義自動轉變爲社會主義。

盧森堡把伯恩斯坦之認爲危機和戰爭已經成爲過去的這種見解駁得體無完膚，但她亦要俟至第一次大戰降臨歐洲，才回到恩格斯首先提出的公式：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恩格斯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階級鬥爭在一個社會之內臨界到某一點，新的階級要是不能取得勝利，文明便會退回到野蠻主義。

所謂「野蠻主義」，是指文明的基本運作——文學、文化、改善生活水準——將受到破壞，屆時，社會將如羅馬帝國之崩潰而倒退。

可是20世紀也不光是人民受難的歷史。20世紀也是人民回擊的歷史。

在20世紀裡，資本主義真真正正的成爲一個全球的制度。在20世紀伊始，全世界約有10億人口，而其中在工業工作的人約有5千萬至1億人不等，世界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到了20世紀末，全球人口約60億，其中約有20億人是工人。各國人民依賴通過市場購買衣食住行所需。

要把20世紀的歷史看成是戰爭和經濟危機史並不難，但是統治階級用以發動戰爭、發動工業化及全球化的資源，又是來自哪裡的呢？

在20世紀的初期，這些資源主要是來自於對農民的剝削；而現在，則主要來自對世界各地的受薪勞工。所以，人們需要放眼在勞工和資本之間的階級鬥爭，才能理解全球制度。

從最基本來說，要問：爲什麼資本家要發動戰爭？他們是爲了利潤而發動戰爭。利潤來自於對勞動的剝削。驅使資本家投到戰爭的程度，視乎對勞動剝削的邏輯。不過，工人的反應，也是這個制度的動力之一。

20世紀的重要時刻，就是工人爲了爭取較佳生活而進行的鬥爭導至爲大型衝突的關鍵時刻。這些衝突，就爲下一個時期的發展奠定基礎。

因而，從1910-1914年，在嶄新的大型產業間發生有鬥爭的浪潮——在美國，有「麵包與玫瑰」的罷工潮；在法國、德國、英國，以至俄國，都有廣泛的罷工浪潮和人民興起。但工人的興起屈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去了。

接著，在1917年俄國革命裡，鬥爭捲土重來；接踵而至的，是兩大帝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於1918年在大規模的工人鬥爭當前崩潰了。

在1920年的意大利，鬥爭高漲。鬥爭的浪潮蔓延至1926年的英國，發生大量佔領工廠和總罷工。

在德國，發生了1923的革命失敗。就是這宗事件，才能讓人理解希特拉在1933年獲得政權的土

壤。

若把上述種種鬥爭從歷史中抹掉，那麼歷史就會教人費解。

這也是失望的歷史，意味到經濟衰落。在大衰退時代，產生工人此起彼落的大型抗爭——1931年、1934年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法國的佔領工廠，及1934-1937年首次在美國興起的群眾性工會主義。

工人群眾的實況，不僅是工人狀況史的關鍵，也是20世紀史的關鍵。這個階級在30年前、50年前，以至80年前已經顯示出它對資本出擊的能力；並且，在俄國這個重要例子中，顯示出它能從資本的手中奪過對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控制權。

在其他事例裡——1920年的意大利、1936年的法國、1956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和1980年的波蘭——工人階級令統治階級陷入恐慌。

就在20世紀之末，我們面臨有兩種選擇。歷史學家艾力·霍布斯鮑在《極端時代》中精警的把這兩種選擇排列開來：「我們活著的世界，被資本主義發展中龐大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進程所俘擄，連根拔起，顛倒錯置……未來不會是過去的延續；有徵兆顯示，我們已臨至歷史的一個危機點。由科技經濟引動的力量，已足以把生態環境破壞，也就是說，把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破壞……人類若要有一個可識辨的未來，便不能讓過去和現在延長下去……失敗的代價，也就是說，無法為改變社會而找出另類出路的代價，將會是黑暗。」

霍布斯鮑提出了診斷，可是卻無提出療法。對於工人之作為一個階級，在20世紀裡一再提出另類的出路——雖然這個另類出路又往往被盜竊去——霍布斯鮑並沒有掌握得到。這便是20世紀的歷史：人民忽然開始感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改變的可能性。

過去20年這段時期，可被看為「工人權力偏斜」的時期。新冒起的工人鬥爭令許多重要國家震撼不已。在1979年，石油工人登上鬥爭場地，把伊朗沙哈王朝推翻。1980-81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把晚期斯大林派國家的極權偽裝刺破。1995年在法國，是工人把保守的政府震撼，是工人令國會得到空前的多數，是工人的鬥爭令法國——及整個歐洲——的政治從此改觀。

可是，工人在這些事件裡俱不是受惠人。

在伊朗，得益者是團聚在霍梅尼周圍的資產階級。在東歐，得益者是那些跑到市場及他們自己那套版本的資本主義民主的舊有統治階級。在法國，受惠者是若斯潘重復生機的社會民主主義。

工人部署的權力是真實不虛的，但弱點在於意識形態方面。

新階級的發展，是在舊有統治階級操縱下的社會原有的思想和價值系統之內進行的。唯有處身其間的條件把他們驅上鬥爭之路，他們才能在鬥爭中發展出嶄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但即使這樣，他們也不會即時地，或全體一致地同時摒棄舊有的方式。這當中有「覺悟的衝突」。

階級中清晰地看到該怎麼辦的部份，需要和仍然體現著舊有方式的那部份階級進行意識形態的爭辯。這便需要有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組織；這個革命組織看到工人是能夠對制度作出挑戰，並且在大衝突發生之前把工人爭取過來。

在21世紀的鬥爭裡，我們要為建立這樣的一個組織而戰鬥。

（史丹譯自2000年1月21日的《社會主義工人報》）

下列書籍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 46 3429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慶祝日本廢除外僑指模制度 T君

從今年4月1日起，強制施行了45年的「外國人登記法」中規定的按捺指模制度終於完全廢止了。

雖然所有的外國人在日本超過90天都得到地方政府去登記並被強行要求按捺指模，此制度的主要對象是在日本居住的第二、三、四代朝鮮（韓國）人。1980年9月，韓宋碩在東京新宿區拒絕按捺指模、拒絕「隨時攜帶登記證」、拒絕「更新」、拒絕「家族登記」，成為反對指模制度的先鋒。因為拒絕按捺指模，已經有22人遭到逮捕、107人不能再入境、6人的「留日更新」得不到批准，有100多人還在打官司。

正是由於這些反抗鬥爭，日本政府在93年不得不改正「外國人登記法」，允許16歲以下的朝鮮人後代不必按捺指模。去年8月，日本國會終於通過決

議，從今年4月1日起，全面廢止按捺指模制度。

4月2日，相關的人士在東京的韓國青年會亞洲青年中心舉行了慶祝集會。會場中還展示了1983-87年運動期間的圖片，和1995年去世的崔昌華的相片。

在集會上，朴容福明白指出：「歧視我們在日韓國人的指模制度，無聲地崩壞了。」「我們20年的鬥爭已經勝利，而日本政府則輸了。」

在會上大家還共同宣言，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廢除「外國人管理法」中的其他各種歧視制度（如選舉權、朝鮮「國籍」歧視等）。

【趙京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
2000年4月10日第1628號】

車臣戰爭——俄聯盟民族問題的後遺症

索納特

俄羅斯在車臣所進行的戰爭，是前蘇聯留下來的後遺症。前蘇聯事實上早已成了各民族的典型牢房。

前蘇聯共有14個加盟共和國，享有獨立、自主乃至分離權。另有20個自治共和國，卻沒有享受這些權利。

在斯大林統治時代，蘇聯加盟共和國享有的所謂權利，只不過是令人作嘔的笑話而已。蘇聯解體後，便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為了奪取波羅的海艦隊佔有權，大多數選民投票贊成獨立，結果導致其他13個加盟共和國也獲得了獨立，新建的俄羅斯聯盟通稱為獨立體（CIS），並由俄羅斯控制，實際上是個鬆弛不穩定的組織。

《社會主義展望》堅決支持各共和國的分離權，支持由他們自己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最後決定。我們認為除此方式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了。

自治共和國中唯一不願併入俄聯盟的是車臣共和國。

1991年5月政變失敗後，蘇聯解體了。格魯茲尼

的最高蘇維埃，受到襲擊，杜達耶夫掌握了政權。印古什原是車臣自治共和國的部份，但沒有捲入這次事變，結果脫離車臣，仍然留在俄聯盟內。

杜達耶夫本人是個性狂熱的前蘇聯空軍將領，他指揮著駐紮在愛沙尼亞的前蘇聯核轟炸機部隊，這就暴露了車臣民族運動的弱點。杜達耶夫這個人物是蘇維埃制度的產物，他在干預阿富汗戰爭中作出卓越戰績，很快便成為車臣民族運動的領袖。

另一個人物卡斯布拉托夫，是車臣派駐俄羅斯議會中的代言人，他不久後成為杜達耶夫政權的反對者，宣佈車臣獨立失效，並將車臣視為無法接受的叛離國家，因此，設法要盡快撤掉杜達耶夫。

車臣為什麼不同於其他自治共和國呢？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因素。車臣曾受到過斯大林統治時代蘇聯政府的殘酷壓迫，其殘酷程度不減於沙皇時代，甚至更激烈。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曾發動一次車臣族大屠殺事件。到了1944年，整個車臣民族中近50萬人，

連同印古什族，在斯大林發出通知幾小時內，便用卡車和運貨馬車被遣送到哈薩克斯坦，他們留在那裡過著非人的生活，直到1957年，赫魯曉夫上台時才使他們恢復原狀，但在此期間，死亡人數高達四分之一（即25萬人）。遭到同樣命運的不僅只有車臣族，北高加索的共和國如卡爾梅克、巴爾卡爾、卡拉恰伊等民族也用同樣方式被遣送出去，但車臣人的被流放，作為整個少數民族來說，所得到的待遇是當時該地區內最殘暴手段體現。經過人口流放後的車臣不再存在了，其領土被其他共和國所瓜分。

車臣族受歧視，一直繼續到二次大戰後的蘇維埃時期，特別是在就業和享受高等教育權利方面更受歧視。格魯茲尼市內，凡需要高技術的專業工作，大部份高級公寓、黨機關的職位，全被俄羅斯人佔據了，而俄羅斯人僅佔人口的三分之一。

俄羅斯最早發起結束車臣叛亂戰爭，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俄羅斯的愚蠢及其低估任務的艱巨性。

從1991到1994年，在杜達耶夫統治下的車臣，像俄羅斯本土一樣，社會不穩定，黑手黨橫行。1992年10月，車臣舉行總統競選，杜達耶夫贏得85%選民投票率。一個月後，宣佈脫離莫斯科而獨立。從政治上來說，車臣已經宣佈獨立，實際上是名存實無，車臣既沒有邊界控制權，不能簽發護照，連杜達耶夫出國訪問時，持的仍是俄羅斯護照。

莫斯科對車臣實施貿易禁運，但仍繼續購買車臣的原油，多數油是車臣人依賴俄羅斯鋪設的油管生產的。而格魯茲尼的足球隊要以俄羅斯足球聯盟名義才享有比賽權。

車臣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來的政府，同所有其他前自治共和國一樣，是由前蘇維埃官僚轉變為民族主義者和穆斯林分子組成的政權。但車臣的獨立並沒有得到北高加索其他自治共和國支持，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主要是其他自治共和國政府一開始便推行親莫斯科政策，此外還有人口比例因素，因為唯有車臣族是佔車臣自治共和國人口中的多數。

1994年底，俄羅斯全面侵犯車臣時，杜達耶夫的政權已經開始蛻化，聲望日益下降，車臣四分五裂了。當葉利欽看到還存有一個分裂的國家時，當然感到很不耐煩。那時俄羅斯總統選舉臨近，葉利欽只有在10%俄國人的眼中是享有威望的。那時極端民族主義者，善於蠱惑人心的齊里諾夫斯基正躍躍欲試地要奪取他的寶座。他揚言道，誰能解決車臣「問題」，誰就是下一屆俄羅斯的總統。

當然也還存在著地緣政治經濟因素。儘管格魯茲

尼油田將耗盡，而煉油廠設備也已陳舊，但格魯茲尼仍然是有戰略上的重要性，從裡海岸的巴庫通向黑海邊的諾夫羅斯克的天然氣油管，都須經過格魯茲尼，而且黑海新油田的開闢，也只有經過這條通道，其原油的成本是最便宜的。

1994年2月，卡斯布拉托夫回到車臣，建議杜達耶夫與葉利欽舉行談判，但因暗殺杜達耶夫事件而使會談擱淺。同年夏天，俄羅斯首次發動攻擊格魯茲尼時，也因反杜達耶夫政變不成而失敗。後來葉利欽周圍主張強硬路線的一派控制了克里姆林宮，於是全面出擊的戰爭終於在十一月間爆發了。

先是，格魯茲尼落在俄軍手中，然後被車臣人奪回，最終，俄軍遭到慘敗。誰能設想人口不到100萬的車臣組成的特種部隊擊敗了1億5千萬人口的俄聯盟部隊。這一事件更加深化了俄國內部脆弱不堪的政治形勢的複雜性，更使俄軍存在的士氣敗落雪上加霜。

車臣戰勝俄軍之後不久，儘管內部情勢比先前更加支離破碎，但仍然是個自由貿易區，大部份非法的產品不斷地運往俄聯盟。

1999年俄軍第二次入侵車臣開始了，這恰是在北約組織發動巴爾幹戰爭之後。此時的政治形勢已不同於1944年了。發動新戰爭的原因，既有與1944年時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的。以下便是主要因素：

- 發動車臣新戰爭，就是為對抗北約的巴爾幹之戰，北約組織的向東擴張，激怒了葉利欽，而在車臣的初戰失敗，莫斯科感到是個奇恥大辱。

- 為了重振俄軍士氣和提高進攻能力。1994年，俄軍將領反對入侵車臣，1999年他們則全部支持。

- 葉利欽力圖煽起愛國沙文主義，自從蘇聯解體後，沙文主義已經減弱了，而在車臣的失敗，打擊特別慘重。而現在，葉利欽急需恢復俄羅斯的光榮。

- 反車臣同時也針對其他自治共和國。給各國以警告，「你們不得鬧獨立」。

- 如同1994年一樣，發動戰爭，部份是為內部政治經濟原因。至少可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

- 葉利欽為了確保他提名的普京在今年3月總統選舉中的勝利。但目前看來形勢不一定有利於普京。據報道，前線的俄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奪取格魯茲尼所需時間，遠遠超過莫斯科的預計，而目前戰鬥仍未結束。這場戰爭有可能拖延一些時間，俄羅斯內外的反響迄今無法肯定。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3月號）

普京尋求一個「強國」

喀魯克

自由經濟領導我們到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呢？市場本身不是萬應藥。前總統葉利欽在1997年招待《Ressiishie Vestic》報記者時說：「我們必須增強我們國家的作用。」

同樣的主題曾在最近被指定為繼任人的普京繼續強調：「對俄羅斯來說，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反常的。相反地，它是秩序的保證和根源，是全部改革的指引者和主要力量。」

西方的傳媒曾把普京的強調理解為：恢復一個強大的國家就意味著回到反西方的冷戰和早期的俄羅斯歷史。俄羅斯對西方批評她在車臣的戰爭反應冷淡，被引用為反西方主義復甦的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解釋矢不中的。如上所提出的葉利欽語錄，強調國家更強大的作用，在時間上早於普京登上政治舞台前好幾年。此外，轉向一個強大國家是出於經濟結果的考慮，不是與西方關係的問題。

貧困不平等和「荒地」的經濟

俄羅斯所謂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是從1991年開始搞的。雖然在蘇維埃體系經濟垮台之前，私人企業已經重新出現——到八十年代中期計它有10%勞動力達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僅一小撮知識分子，甚至只有限地把握到市場經濟的本質。

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觀念，就是過分簡單化的思想，降低國家的作用到最小限度，對私人企業棄掉束縛開放經濟。這同八十年代同仍然佔優勢的撒切爾夫人——里根經濟政策的正統觀念是相一致的。

對千百萬的俄羅斯人來說，追求這樣的一個經濟戰略，證明是十足的災難。

單只在1992第一年——整整一年的經濟改革——實際的工資降低超過三分之一，平均個人消費額下降到40%，通貨膨脹達到2,500%，而將近三分之一人口跌到官方貧困線以下。到1995年末的工資，只是1990年所得的一半，而國家的養老金低於政府規定的貧困線以下30%。

在1991年到1994年之間，死亡率增加到25%，嬰兒的死亡率增加近15%，自殺率差不多一倍，平均壽命從63歲降到57歲。在西方曾經有效地消滅的傳染

病，突然重新出現，並遍及俄羅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料想的經濟穩定是短命的。1998年8月俄羅斯政府不履行她的債務，讓盧布自由降落。

在四個月之內，盧布對美元的價值已損失三分之二。從1998年8月到1999年春季，真實的工資降低40%，失業記錄增加到大約30%，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率急升至近40%。

大量的不平等事實在俄羅斯社會曝光，甚至比曾經在斯大林主義下曾經存在過的還更多。當時幾乎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享有西歐的生活水準，20%的人口享有國家收入的50%的財富，當時的股票達到最低點，有20%從10%降到6%。在俄羅斯，社會不平等很快像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那樣大。

在俄羅斯內部，貧窮和不平等迅猛擴大，並不意味著在20世紀九十年代嘗試過渡到資本主義已經失敗。貧窮和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但是事實上九十年代的經濟政策是摧毀——雖然並不全部地——斯大林主義支配下的經濟結構，在重新安置他們使之起到資本主義的功能方面失敗了。正像塞恩。古斯塔夫遜在《俄羅斯式的資本主義》對1998年失敗的評論所表述的那樣：

「『八月的失敗』明白表示出在強烈的解除痛苦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經濟被證明是試驗的時候，是多麼易於扭曲和損壞的。它顯示俄羅斯的過渡到貨幣基礎經濟和一個國家市場，仍然僅僅是部份的……因為『八月失敗』戲劇性地顯示這個經濟仍是一個無人地帶（或荒地），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實即指斯大林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

私有化

俄羅斯「無人的地帶」經濟形成於九十年代的過程中，表面上有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的裝飾品，但沒有資本主義的實質，這樣的三個樣版是：私有化、銀行系統和股票市場。

假想的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是引進大規模的國家工業私有化。1992年到1996年之間，國有公司從205,000家減少到91,000家，作為比較：西方國家實

行私有化計劃一年裡出售不到兩百家公司。

在私有化的第一階段（1992-1995），公司實際上是被放棄了：俄羅斯公民被發給憑單（大約值30美元），這些憑單可以在任何私營公司交換股票。在第二階段（1995-1998年），20,000家最大的和最有意義的國有資產以最便宜的價格賣給新寡頭政治成員與右派的政治有聯繫的成員。

兩個階段的私有化的共同點是他們做不到提高資金投資到新的私營企業中去，正如一個俄羅斯經濟學家所表達的：「我們以兔子的價格賣了一群象，而現在新的擁有階級正試圖以一天一個胡蘿蔔的價格來飼養它們。」

按理說，私有化企業不再需要迎合由國家集中安排的「計劃」生產指標了。但與此同時，對於市場經濟的運轉，絕少的經理認真地嘗試去適應他們的公司。

約瑟夫·巴拉茨寫的《克里姆林宮資本主義：使俄羅斯經濟利己主義化》衡量私有化企業的變革，拿69個「改組的活動」項目的等級來較量，平均分是20分，而且沒有公司得分高過41分，大部份的變革是短期的，而且只裝裝門面。大多數的經理仍關注於國家的干預，諸如在他們的企業中對於問題的解決辦法等。

此外，就是工業生產的地位，對於貨幣的滲透，大多數仍然保留抵制的態度。大約70%的工業處理普遍地進行易貨貿易來安排或者發行期票（vekselia）。工資是延遲付給的，要不就常常以貨代款，而不支付現金。

這個所謂「現實主義的經濟」是在易貨貿易和憑單的基礎上運作的，仍然約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25%，它不是官控經濟，但它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起作用。

金融

在新的私有化工業裡投資，還不能從九十年代期間在俄羅斯像雨後春筍般的私人銀行里唾手可得。到1997年，有1,600家私有銀行，但它們當中的60%每家有不到一億美元的資本，而他們當中90%有資本低於三億美元。它們的規模不僅小於西方銀行，它們的經濟活動性質也不相同。

俄羅斯銀行不嘗試通過投資和公司的改組去推進工業和經濟的增長，一個莫斯科為基地的銀行在1997年的調查揭露：他們的貸款只有1%以上有一年多的期限，而實際上他們的貸款在工業方面沒有財政

的投資方案，而大多數的銀行卻傾其全力去搞快速利潤。

在九十年代，這是不難的。銀行以低利盧布存款兌換美元，以高利率的美元借給籌措短期商品出口、兌回美元、換取盧布、並且大量地歸還無價值的盧布給存款的帳戶。

九十年代中期，當通貨膨脹下降，銀行就炒政府債券票據以賺大錢。為了籌措它的虧損資金，政府發行三個月和六個月的高息債券票據。這些債券兼備高回報、低風險——直到政府拖欠它的債務到1998年夏季才償還。

股票市場

在全面資本主義的西方，俄羅斯銀行已經是一一而且仍然很時常是一一個「真實的東西」的軟弱的模仿者。同樣地具有真實性的俄羅斯股票市場，卻不斷地失敗於資金的吸收，並把它們派上最好的用場（以資本主義的條件來說）。

小規模的俄羅斯證券交易主要地用私有化憑證的形式，開始於1992年，ROS指數（第一個俄羅斯股票指數）在1994年開始為116點，到1994年九月達到1,706點，但到下一年1月它暴跌到600點。

1996年3月，RTS指數（它代替了ROS指數）降落到最低的66點。往後的18個月有了穩定的回升，到1994年10月，RTS的指數達到571點，但接著股票市場再次回跌，到1998年7月，它滯留在134點，到10月，在政府的違約和貶值的災難性後果期間，它暴跌到34點。

俄羅斯股票市場的弱點遍及整個九十年代，根源在許多因素的結合。

正當的管理和控制的缺乏，方便了詐騙行為。一些外國投資者發現，他們給不存在的公司付給了大量獎金。另一些人，他們所買的不是股票證券，而是往後要買證券的預約合同。

政治的和經濟的不穩定使投資失去信心，尤其是海外的投資。在俄羅斯潛在的小投資者寧可儲存美元而不願去冒俄羅斯的安全風險，尤其是在1994年股票暴跌之後，至於私人銀行，已如上面所述的，與其玩股票，毋寧去找有利可圖的活動。

經濟學教科書描繪一個股票市場像「一個關於公司行為的資本和市場訊息來源的流通器」。俄羅斯股票市場實現的並不是這些作用，而從前甚至比後來的作用更少。它具有一個資本主義中央協會的名稱，但卻不實現協會的作用。

財富的積累

一小部份俄羅斯人在九十年代的歷程中致富，尤其在這十年的早期。但是那種積累財富的方式，並不給前進中的資本主義發展作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部份提供基礎。

私有財富是在三個交迭的浪潮中積累起來的，它們的根源，在於國家結構和國家作用的削弱。

第一階段，把一個獨立的俄羅斯突然事件的同期事先確定，是由於對對外貿易調動國家的壟斷權而激發起來的，壟斷權是在物價由國家津貼、但仍不自然地維持在低水平的時候被刮走的。

任何人都可以以受控制的國內價格獲得像油、鋼鐵或者珍貴的寶石某商品，然後以國際市場的價格向海外銷售，能夠在一夜之間或多或少地致富起來。共產黨的官僚、犯罪分子和任何人，都可以打這個主意去賺得一筆大錢。

第二階段就是以金融投機為依據。九十年代的頭幾年是一個火箭式的通貨膨脹。在1991年和1995年之間，物價增長約10,000倍，任何人都可以能夠便宜地借到錢，並且迅速地把它變成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掙到錢財。

在出口資金賺來的錢比金融業大得多（如上所述，貨幣投機在九十年代早期是俄羅斯銀行的主要來源）。政客們也靠這個方法來發財，他們從城市和地方的預算中把錢借給銀行，然後為他們汲取利潤。

第三階段是私有化計劃，如上所述要點，國家資產被放棄（憑單私有化計劃），或者在往後的幾年，賤價出售國家資產。

在前一種情況中，企業以賤價從持有者手中買到憑證；在後一種情況中，企業以平價直接從國家買進。企業中的許多單位就這樣全部買進，接著就成為被奪走資產的受害者。

所有三個階段的共同點是：財富的積累是通過投機迅速致富的方式。它不包含生產能力的投資、生產的利潤。那些投資和利潤，當時是為一個更進一步圍繞著主要的補助價格（政府以各種補助形式維持商品價格——譯者註）提供的基礎。

此外，這三個階段的財富積累實質上是一次過的機會。國家控制的國內價格的取消；在出口投機事業方面猛砍利潤的界限。這個時期末的超通貨膨脹，結束了由貨幣投機而來的旋風利潤。而從前國家經營的企業，到九十年代結束，大部份都已被賣光了。

這就是說，九十年代早期財富積累的主要途徑，

到十年結束時大部份已不存在，但鋪下的基礎，沒有起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

國家的弱點

葉利欽統治下的俄羅斯國家的經濟任務基本上是否定的。它刮掉了主導經濟的結構（國有化工業、控制價格、國家壟斷、蘇維埃立法），接著就指望「自由市場」來重建俄羅斯經濟。

但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大眾貧困，基本機能喪失和充滿罪行的經濟。俄羅斯經濟當然要停止成為國家指令的經濟，但沒有真正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

九十年代自始至終國家缺乏意志和能力兩者，更果斷地對經濟和嘗試對國家的經濟調整給予方向性的干預。

跟隨著西方的自由市場「專家」的勸告，它關注著對一個健全的經濟的原則進行相反的干預。此外，政府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各自的宗派，就是他們自己，就近方便於靠「自由市場改革」的迅速致富機會發了財。

因此，很少有人，或者沒有人試圖管理國家的金融和股票市場，那些在上面已描述過了。甚至在嘗試要去管理的地方，也沒有執行的機構。而且沒有人企圖去保護國家資產，使之免受利己主義者的掠奪，那時候，政客們自己也參與搶奪。

但是，這個接著發生的經濟混亂，在國家干涉能力方面也受了損害，縱令它有這個意願去那麼做，對於貧困的形成，國家本身跌落為犧牲者，這又加強了它的全部弱點。

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44%納入國家稅收，到1998年官方的數字已降到29%。但這不是全部的情況。大約40%的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是非官方經濟生產的，因此並沒有記錄在官方的統計資料中。而官方的國內生產總值本身，自從1990年以來，大致下降了一半，在九十年代這個過程，國家的稅收大約降低到75%。

逃稅——這個資本主義的弄虛作假的方式，假計劃，假產量統計，那些主要是對斯大林主義支配的經濟——九十年代，自始至終猖狂蔓延。登記的俄羅斯商業只偶然地交稅，而30%根本不納稅，不登記的商業（擔負40%的國內總產值）也照樣不納稅。

九十年代期間國家收入的暴跌，國家的支出也就不可避免地暴跌，貨幣的真實價值任由它更遠遠地落後於通貨膨脹，國家僱員的工資，在真實的費用方面也同樣降低了，工資的增加是不規則的。從資本主義

的觀點看，這是不必要的一件壞事。

但另一方面，在國家支出衰退，與要求建立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工業和農業的投資也衰退了。同時軍隊、警察和稅收官僚就成為嚴重的儲備不足的犧牲者。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如恩格斯所闡明的，是作為一個整體代表統治階級去管理的。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國家太過軟弱而不能執行它的任務。它不是統轄一個改組的經濟，而是一個崩解的經濟。它能夠埋葬官僚經濟的屍體，但不能復活資本主義。

兩者擇一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像塞恩·古斯塔夫遜那樣，認為在俄羅斯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失敗的根源，在於前蘇聯國家的軟弱：

「這個民族國家開始為財產的私有化和市場的興起打開了道路，其弱點，是由於它妨礙市場經濟在一個健全的基礎上發展。……」

「俄羅斯的第一個前蘇維埃的十年經驗曾經是生氣勃勃，值得人回憶的，那時沒有強大的市場經濟，沒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它是創造一個單一市場空

間與單一國家貨幣的強國。它是這樣的強國，對財產權和全國提供基本的保護，實施企業管理，並主張競賽，和補償市場的缺陷。……

普京和他的政治同盟者作出同樣的分析：「政治的和經濟的混亂刻劃了葉利欽年代指令經濟的崩潰，在這個混亂之後，新的俄羅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是一個時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穩定。

而領導這樣的穩定的機構，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社會主義者對於在俄羅斯創造一個強國不感興趣。

普京的強調一個強國的角色，不是回復到蘇維埃式的政治（這種政治無論如何與社會主義沒有共同點），而是嘗試去為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創造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

在幾十年的斯大林主義的分化和鎮壓之後，俄羅斯的工人運動仍然虛弱，普京是一個差不多像葉利欽那樣的敵人。對於普京每一個成功，或者在車臣的戰爭，或者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將是一個倒退。

（柳真譯自《工人自由》2000年2月號）

美國插手哥倫比亞，和平前景暗淡

哈特曼

1998年7月哥倫比亞保守派人士安德烈·帕斯特拉納當選為新總統，他公佈了新和平倡議，這對結束長達32年政府與左翼游擊隊之間的內戰，帶來了很大希望。內戰曾使100萬人流離失所。

帕斯特拉納總統曾與最大的游擊隊FARC（哥倫比亞革命軍）的領導人會晤，他們同意在1999年1月重開和平談判。政府也同意將南部5個市成為非軍事區，讓「FARC」控制一個相當於瑞士那麼大的地區。

同年2月，另一個主要游擊隊UC-ELN（卡米里斯塔同盟——民族解放軍）也開始和平進程，與全國人民運動的代表討論全國人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

今天和平進程又擱淺了。准軍事組織暴力行為有增無減，而游擊隊也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範圍。談判在

7月間破裂。政府指責游擊隊在非軍事區濫用權力，而游擊隊則埋怨政府對解決戰爭的根本原因不感興趣：這就是財富分配不均，窮人被排斥在政治體制與經濟利益之外。

尤其是，游擊隊要求廢止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因為這會把國家經濟命脈完全向外國投資和對外貿易開放。10月間又恢復了談判。

由於和平希望之光逐漸暗淡，哥倫比亞上空又出現新的烏雲。在美國帶領下，其他南美諸國向哥倫比亞採取聯合軍事干預。

美國干預

過去18個月中，美國借口反毒鬥爭，加強對哥倫比亞的軍事干預，並在哥倫比亞與鄰國的交界地區

助長了軍事化。目前，哥倫比亞是接受美援的第三個大國，1995年美國國會批准給予哥倫比亞2億8千9百萬元美援，三倍於前一年。7月間美國「反毒大王」B.麥卡弗里要求給安第斯山區增撥10億美元作為反毒緊急援助，其中半數撥給哥倫比亞。

美國對厄瓜多爾和巴拿馬能否保衛邊界安全表示懷疑，聲稱邊界地區受到游擊隊與販毒者的威脅。在美國政府壓力下，厄瓜多爾、秘魯、巴西、委內瑞拉等國政府調兵譴將，加強哥倫比亞邊界地區軍事化，進行軍事演習。

根據媒體報道，美國在哥倫比亞南部派遣自己軍隊。在美軍南方指揮部控制下，派遣一支特種部隊駐紮在秘魯、厄瓜多爾與哥倫比亞邊境上。

中央情報局計劃

根據阿根廷《號角報》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制訂一項計劃，要從秘魯和厄瓜多爾兩國邊境陣地干預哥倫比亞販毒活動。實際上，美國政府並沒有真心誠意來抑制販毒活動，其真正目的是要破壞哥倫比亞農民的古柯（coca）種植園。目前古柯種植區已是五年前的兩倍，哥倫比亞大多數古柯種植者靠此謀生。美國政府力圖要撕毀1959年簽訂的國際咖啡協議，迫使數以千計的咖啡種植者失業。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哥倫比亞政府發動的「反毒鬥爭」，旨在針對哥倫比亞的游擊隊和種植古柯——咖啡的農民。

販毒大王

控制毒品貿易的販毒大王事實上沒有受到打擊，而是讓他們放任自流。相反，准軍事組織與武裝部隊密切合作，發動一場骯髒戰爭，旨在打擊哥倫比亞的工會、農民和市民等組織，而毒品貿易活動則完全沒有受到懲罰。

販毒大王積累了大量財富，其中大多數款項是從哥倫比亞販毒到美國而得到的，這些巨額款項都存放在美國銀行裡。

在「反毒鬥爭」口號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真正目的、即要終止拉美地區持續已久的游擊隊起義。哥倫比亞革命軍和卡米里斯塔——民族解放軍的勢力，日益壯大，他們控制了哥倫比亞百分之四十地區，而活動範圍佔該國領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游擊隊向人民提供基本服務，保護人民免受准軍事組織及武裝部隊的侵犯，在他們控制的人口稀少地區，他們還排解人民當中的爭論和維護司法權。

游擊隊目前還不可能推翻哥倫比亞政府，但已構

成對美國廣大後院的安全威脅。游擊隊還是拉美其他群眾運動的鼓舞力量，而哥倫比亞本身則居於高度的戰略地理位置上。

哥倫比亞緊靠太平洋和大西洋，是進入南美的入口要地，天然資源豐富，有不斷增長的工業部門和市場，這都是美國公司無限嚮往的地方。由於美國要把巴拿馬運河管理權交還給巴拿馬，美國正設法要在哥倫比亞等國建立新的軍事基地，來代替巴拿馬的霍華德軍事基地。

海軍基地

美國正與厄瓜多爾商談要在曼塔市建立海軍基地。根據《號角報》報道，它要在阿根廷擴大其「治外法權」，從美駐阿根廷大使館擴大到北部機場，作為美在哥倫比亞軍事行動的基地。

美國試圖爭取南美各國支持，在哥倫比亞建立一支區域性的武裝干預力量。1999年6月間，在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上，美國提出「保護民主」法案，要求建立一個「友好集團」，以此作為多國力量插手拉美，用以保證民主。

美國提出的這一法案，已被視為對國家主權的威脅，是美國干預的口實，終於被擊敗了。然而阿根廷表示，只要哥倫比亞政府提出要求，它準備參加這「友好集團」。

區域性武裝干預力量有可能擊敗游擊隊，但不能給哥倫比亞帶來和平、公正和真正的民主，也遠不能消除戰爭的根源，反之，還會加劇了它。這個法案僅僅有利於哥倫比亞的上層勢力，包括販毒大王、准軍事組織和武裝部隊，有利於抑制下層的反抗。唯有下層的反抗，改變現狀的壓力才是唯一出路，才能替代暴力行為，消滅貧困，而暴力和貧困曾使多數哥倫比亞人民生活在苦難之中。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展望》99年11月號）



英國工黨左派改良主義的局限性

特爾弗

〔英國工黨知名左派東尼·本宣告退休，這項宣佈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特爾弗在本文對東尼·本的政治生涯以及工黨左派當前的狀況，作出總結性的評價〕

東尼·本最近宣佈他退出議會生涯的意向，表示他將不會競選下屆連任。他的引退，一般地代表著英國政治的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尤其是代表著左派時代的終結。

東尼·本現年74歲，是工黨任期最長的下議院議員。他在1950年首登國會，作為必里斯托東南部議席的議員，直至1983年止；其間，只有3年缺席。在這3年缺席中（1960-1963），他由於忙著為放棄承繼他父親的貴族銜頭而鬧個不休，所以被迫暫時離開下議院。在東尼·本全部的政治生涯中，他一共進行過17次國會選舉的鬥爭。在上一次大選，他重新獲得位於徹斯特費爾德的議席（他曾在1984年補選中初任這個席位）。從1959-93年間，東尼·本歷任工黨全國執委會成員之一。

東尼·本其人及其政見

東尼·本素有「獨立特行」之譽。在他就任郵務總監其時，他曾試圖取消以女皇頭象印行的郵票。此外，他又以愈老愈激進而見著。前工黨黨魁威爾遜曾經這樣評論東尼·本：他的「不成熟與年俱增」。

東尼·本儘管以左翼見著，但他從不自稱為革命者；他甚至否定英國有來一場革命的需要：「英國工人運動之所以不像其他社會主義者在其他地方那樣從未曾與革命的途徑聯在一起，乃由於我們把民主政體培養成必須通過一個充分運作的民主議會來表述。因此，要求英國工人運動放棄民主政體而改用某種政變的捷徑來走上社會主義，不啻是要求我們否認我們的歷史。」

東尼·本的改良主義，在以上的摘引中確鑿分明。據他聲稱，英國人本能上是民主的（他指的是依附於議會），故此毋須求諸於「外來的」革命思想。從工黨建立伊始，就有這種左派改良主義販賣。

東尼·本的理論投靠於改良主義（儘管是最左傾的那一種），這說明了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之起伏；他的成就始終是有限的，受到資本主義的約束所制肘。東尼·本自吹自擂的激進主義，以及他的政治生命的特色：時而妥協，甚至時而背叛，就是他依附改良主義而導致的結果。

東尼·本早年在1960年代的工黨政府威爾遜及1970年代的卡拉漢政府中，出掌幾個要職，分別是科技大臣、工業部長和能源部長。正是在這段時期，他對「民主政體」和議會的投入表現無遺——雖然這意味到對工人進攻。在整個1970年代，包括1978-79年被稱為「不滿之冬」期間，工人用罷工行動來反對工黨政府藉「社會契約」之名強行裁減工資，東尼·本卻堅持工黨內所謂承擔「集體責任」的原則，對於卡拉漢和希利刻意損害工會的政策，拒不作出挑戰。他既不辭職，也不投反對票，甚至不肯發言反對政府。對他來說，設法令工黨留住執政地位，是第一優先，與工人站在一道，只屬次要。

議會利益先於工人利益

東尼·本在日記中承認，在他擔任能源大臣而正值運油車工人罷工的時刻，他準備不惜動用軍隊以粉碎罷工，俾讓工黨能繼續執政，同時也保護他之身在政府內部（而非政府之外）作為反對派的聲音。

在這同一時期裡，他又向「全國礦工工會」進攻（「全國礦工工會」在1984-85年為反對戴卓爾政府關閉礦場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當時東尼·本則給予堅決的支持）。他使用的方法自是與右派不同。東尼·本以把工會領袖邀請到辦公室共喝奶茶著名，他們雙雙坐在工會的會旗前面，但客氣的背後是暗藏機關。

作為能源大臣的東尼·本推行了大規模關閉礦場的計劃，他夥同「全國礦工工會」的右派，推行一套地區生產計劃。按這個計劃，把各個地區分化，讓地區之間明爭暗鬥，從而得按煤產量計酬的方法破壞了行之有素的全國商定薪酬的方法。

那時候，「全國礦工工會」全國工人的投票結果

是反對這套地區生產大計，但東尼·本聯同當時的工會領導一同耍出手腕，改而用地區投票來點算；從而令該項計劃得以強行通過。到了1984年全國礦工大罷工的時候，這項計劃的嚴重後果，它對工人利益的叛賣性，便一覽無遺。得利於地區生產計劃的地區，僅由於地理資源豐富使然，但到了大罷工時期，則成了破壞罷工、拒不參加罷工的重堡，對1984-85年這場可歌可泣的全國大罷工造成致命性的破壞。

1979年之後，工黨下野，展開了漫長的反對派角色；這段時期，亦是東尼·本主義的全盛期。工黨在1979年的大選落敗，這在黨內引起了大震動。許多工黨活躍份子抨擊卡拉漢領導層的失敗，也正確地抨擊領導層對工人階級的攻擊。這些黨員在「永不再犯」的口號下團結起來——口號的意思，是指工黨政府再不會自毀綱領，再不會向工人階級進攻。

由於工黨右派所得到的結論剛好相反，即認為是工會和工人階級把黨拖垮，因此，黨內遂無可免的產生一場惡鬥。由於東尼·本站在「永不再犯」的口號之下，他迅速躍升成為黨內愈趨壯觀的左派的領袖，推動黨章改革，對領導層的權力作出限制，對會員的權力則予以擴大。

妥協和叛賣

1981年是東尼·本派的全盛期，它驅使了黨內的右派脫離工黨，另外組成了社會民主黨。左派高漲之勢，令黨內仍然留下的右派與工會高層的官僚奮力還擊。他們提出要脅，或是全體退黨，或是東尼·本派中止改革。東尼·本遂向右派讓步，偃旗息鼓，把改革運動解散。東尼·本在1982年宣佈，左派大勝，接下來的年月，是全黨緊靠在一道，迎接大選。

東尼·本全力支持右派領導層希利之舉，令左翼解除武裝，失去方向。工黨在1983年大選全線失敗，連東尼·本自己也失掉議會席位。這使右派乘機誘過於左派，並且名正言順地重新向資本家靠攏。東尼·本向右派的投降，令黨內左派全線崩潰，並且蒙受清黨的迫害。東尼·本的基礎被清除出黨，而之前的改革被打回原形。左派退卻之勢，持續到90年代末期的今天，仍然不得翻身。

東尼·本及左派之失勢，及貝理雅挾工黨之捲土重來，重新執政英倫政府，這兩宗事，都是對英國資產階級有利的演變。

貝理雅對工黨所作的變革及他的競選策略，兩者

的政策俱是箝制左派，使後者無從發揮諸如早年對黨之影響力。貝理雅輕而易舉的向黨章第四條開刀（此條是主張生產資料國有化），這對東尼·本和左派不啻是釜底抽薪，令左派現在處於空前劣勢。

東尼·本在較早前宣佈不再競選連任，但他隨即補充說，他之離開國會並不等於離開政治，他仍然會和那些「希望看到工黨重投社會公義、重投民主社會主義及和平的事業的人，不論他們在國會內外，緊密的合作。」但東尼·本及他的同道儘管對貝理雅治下的工黨及國會的演變持有尖銳的批評，他們卻沒有扭轉乾坤的手段。

政治集權化開始

東尼·本對貝理雅在工黨和國會運作方面作出的變更，具有敏銳的批評。就貝理雅推動的所謂「現代化」方面，東尼·本指出那實質上是任意授權制，即貝理雅益發運用個人權力以委任人員出任國家要職，其做法是逾越了黨內會員或國會之權。例如貝理雅委任多名來自保守黨的要員，出任政府要職，就是例子。此外，貝理雅在歐洲議會選舉及蘇格蘭國會選舉，及威爾斯議會選舉方面採用了選舉名單制，其用意也是同出一轍。即是，選舉人除了貝理雅個人自己提出的選舉名單外，無從選擇他們屬意的個人候選人。還有，貝理雅授權英國銀行行長本人直接有權厘訂利率，也是同一種趨勢。

按東尼·本脫離國會而作出的聲明所示，國會的性質也有改變，而這並且是令他決定離開國會的原因。據他觀察，政治正在脫離出國會而向外活動，而且國會的作用也在改變，「從我們可以用作為控制經濟的工具，變成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控制我們的工具。」

不過，國會向來都是在資本的利益前低頭這點，其實基本上並無改變，只不過改良主義的最大謊言，正是幻想國會可以被工人階級利用為箝制資本主義惡魔的工具。

東尼·本一以貫之的立場，倒是在下議院內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只不過，他每次都把解決衝突的希望，訴諸他改良主義的另一個大謊言：聯合國。例如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聯合國對前者施予制裁時，東尼·本是全盤支持。一俟作為具體攻擊行動的先聲的制裁實實在在的發難為軍事進攻的時候，東尼·本及其支持者卻怨聲載道，抱怨制裁仍未有足夠的時間發

揮作用哩。一句話，東尼·本的和平主義路線，並無看到帝國主義為何需要對戰爭負責的邏輯。在他看來，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在為了達到其目的而使用的策略是在在在不同的，諸如戰爭，是本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策略。然而事實倒是相反。不管帝國主義選擇用什麼策略：制裁或炸彈，或不管其他什麼，俱是爲了同一個目的；通過武力和暴力，把帝國主義的意志強加到整個世界去。

左派改良主義小罵大幫忙

東尼·本向來是國會議員間的「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要員。這個團體共有40餘人，其中活躍的核心又要細小一些，約只有3數人眾。此外，其他「官式」反對派尚包括有「勞工改革組」。這些團體反映了左派改良主義的主張。譬如「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理論家」亞倫·辛普森的政策，是主張政府依據凱恩斯經濟學和貝弗里奇的社會施政的路線對經濟作出干預。簡言之，辛普森是認爲有可能把國際資本主義料理得服服貼貼，以對工人階級有利。

另一個「理論家」簡·利文斯通的主張和辛普森相若，但他對於工黨之向中產招手感到厭惡，並且關注工黨之尋求與工會解除聯繫的不良後果。

「勞工改革組」把保衛工黨的內部民主看爲己任。他們認爲，主要的方法是扶助會員更多參與制訂政策及決策過程，令決策權分散，不要集中在一小撮愈趨小眾的領導層的手上。此外，又希望責成當權者向會員交代。在他們看來，上述問題是工黨的主要問題所在。

「勞工改革組」認爲工黨的中心目的是確保社會公義，保證經濟繁榮，對此，修改後的黨章第4條是能夠達致目的之手段。就黨之把與工會的關係降格爲眾多的利益團體之一（如志願機構、社區組織），該組全無異議。換言之，他們本身也是在「現代化」搞手之列，只不過認爲有需要對貝理雅作監察吧了。他們對貝理雅在黨和國會所做的變革本身沒有異議，但感到要對領導層作出制衡，所以，他們刻下正在草擬《工黨權利憲章》，以滿足不滿黨內權力日趨集中化的會員，其觀點就如他們的其中一篇文件所述：

「自選舉以來，領導層和黨員之間清楚地出現了分歧。這個分歧並非來自黨結構的現代化——沒有多少成員會希望回復到煙霧瀰漫的抽煙室或被運動鬥士滲透的時代去——而是出自於通過新的結構，會員們

能對政府的方向發揮多少的影響。一個現代的、民主的黨的原則沒有被遵守。黨的政策是通過了廣泛的諮詢程序，但這個程序並不透明，以致容許了由少數的中央精英決定了政策之制定，並且強加到會員的頭上去。會員被撤掉對代表的選拔權，代之而起的是任意授權的方法。辯論期的長短受到緊縮，而不同的觀點並未獲得發言餘地，哪怕事前已有充分的知會。會員沒有機會對政策文件作出局部更改——這些政策文件的提交形式是：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盤否定。其他選擇方案拒不受納。一人一票的原則日漸受到委員會的閉門會議所侵蝕，而這些委員會閉門會議本該是受到廢除的。」

換言之，「勞工改革組」要處理的，純然是黨的內部運作的問題；至於政策問題方面，他們表明是沒有他議的。這類鬆散的團體都同樣認爲，通過對資本主義作出更優良的管理，是能夠發揮改良作用的，而工黨則是達到改良的輸送帶。

把一述團體聯結起來的是工黨內部的「中間左派草根陣線」。這個陣線在過去兩年來皆有角逐全國執委會的職位。他們在1999年推出的兩名角逐代表，皆是在1998年大選中成功勝出的候選人。他們的共同處，在於不提黨內政策，只提黨內民主以角逐全國執委會的位置。

這個陣線之採取「中間左派」的名稱，具有著重大的意義，表示到他們認爲有必爲選出兼有中間派和左派的協作機關，並藉此表明他們無意在「黨中有黨」。

至於工黨內其他尚餘的左派，不論是個人或以小組形式，還是一如既往，唱著東尼·本多年來高唱的調子，即工黨仍然是推動社會變革的輪子，諸如此類的神話。

不過，今日的工黨左派的目標，總括來說，已是和東尼·本當年大不相同。當年的左派，是對整個領導層作出相當的挑戰，以令「黨之保持作爲勞工的黨」，哪怕這種挑戰力是多麼的不足。

當務所需，是一個通盤的戰略，使一勞永逸的揚棄希圖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令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有利的這個神話。這個戰略，要對貝理雅及他的政策來一次真正的鬥爭。換句話說，這個戰略是爲了把工人爭取過來，脫離對改良主義的依賴，讓工人走到革命的一邊去。

（史丹摘譯自《工人權力報》1999年9月號）

世界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 與無產階級領導層的危機

(三)

《社會主義者行動》

古巴

1959年的古巴革命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島上的經濟和社會的生活。革命後的兩年內，資本主義制度已被我們所稱的「工人國家」所代替了。

古巴創立了一個計劃經濟，使幾乎所有工業、大商業和大型土地所有權不再由私人所擁有，不再為私人利潤而經營，而是為大眾福利而經營。

* * * *

我們在尋找恰當的名稱來描述古巴時，一向反對使用「變態的」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等名稱。

古巴的工人民主當然有了變態。但是，在我們的術語學中，「變態的工人國家」這個名稱，既是描述性的，又是綱領性的。它在政治上是相等於這樣的觀點：這個國家是被一個結晶化了的官僚階層所控制，而這個官僚層必須以政治革命來推翻之。

正如約瑟夫·韓生（Joseph Hansen）在他的「討論古巴是為了什麼」一文中所用的，我們在描述古巴為一個工人國家時，加了「『還缺乏民主無產階級統治形式』的這個修飾詞，意思是：雖然它不是像有了斯大林主義者當政那樣的『變態』，但這個國家並不是在工人和農民的民主控制之下的。」（引自「古巴革命的動力」）（註）

（註）我們對古巴的立場仍然是與我們過去的決議一致的。這些決議包括韓生的《古巴革命的動力》（紐約，尋路人出版社）一書中所收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1979年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保衛古巴革命》和社會主義者行動1992年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受包圍的但是無畏懼的古巴革命》。

最後一個文件已被Walnut出版社出版為一本小冊子。

而且，從開始，古巴的行動革命者們就已抵抗蘇聯和古巴的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的壓力。

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62年，當他擔任整體革命組織第一書記、古巴革命政府總理的時候，領導了第一次公開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和右派宗派主義的鬥爭。

這第一個交鋒發生在埃斯卡蘭特企圖以官僚手段來接管整個革命組織和國家機構的時候。當時，埃斯卡蘭特是整體革命組織中的斯大林派的一位領導人，而整體革命組織是卡斯特羅的七·二六運動及與之同盟的小團體與埃斯卡蘭特的人民社會黨合併的結果。卡斯特羅在他的1962年3月26日的演說中正面地攻擊斯大林主義者們，其打擊之大使他們從此以後一蹶不振。（1）

而且，甚至現在，在它目前這個緊急的存在關頭，卡斯特羅派領導層仍然繼續努力地阻礙結晶化了的官僚層的形成。據報導，古巴共產黨的卡斯特羅左派，在該黨最近的大會上（1997年10月），對其右派施以重大打擊。

而且，在菲德爾·卡斯特羅1998年7月26日的演說中——這個演說曾被古巴所有電子、印刷傳媒所傳佈——他重申了他的黨和政府對實現世界社會主義這個目標的承諾。

古巴的革命領導人們，從開頭，便已向工廠中、田地上的古巴工人們、無產階級的所有天然盟友們的階級利益，顯示出忠誠。但是，至於缺少蘇維埃式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他們卻建立了他們所稱的「人民權力」。可是這種「人民權力」，離真正的工人民主，還有一大段距離。

真正的工人民主，對古巴的社會主義前途，至關重要。它是以俄國工人們為了實現十月革命而創立的、在政治上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機構為模型

的，並不是被斯大林在其政治反革命之後所強加的那個被剝去了精華的版本。

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人民權力是，或者被設計成爲，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一個形式，像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所設立的那樣，用來動員非無產階級的社會力量，以支持官僚階層向資本主義過渡、向資本家階級蛻化的企圖。

議會民主，其更好的名稱是金元民主，給「每個人」選舉的權利，但是，塑造、製造「民意」的權力，卻操在有足夠金元名副其實地壟斷傳播媒介、有足夠財力收買政治家、國家官員的極少數人的手上。

總之，人民權力不是韓生所說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但是，它也不是資產階級議會民主。

當然，在事件發展過程中，在古巴活躍的落後、反革命的力量，也許會給人民權力加入資產階級議會的內容。在另一方面，古巴社會中的革命力量，也許會設法將這個模稜兩可的選舉指示轉變爲工人階級政治專政的一個真實的民主機構。

這些反對的傾向，不但含蓋在古巴當前力量關係中，而且含蓋在世界當前力量關係中。

古巴的黨和政府的革命骨幹份子，當然知道因開放經濟讓外國資本滲入所帶來的真正危險。古巴的革命者們完全知道，滲透入工人的民主機構、工會和工人政黨中，腐蝕工人領袖並把他們轉變爲資本家們的勞工及（或）「社會主義」副手，則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第二天性。

因此，這個充分有理的恐懼，也許使他們看輕了工人民主對保衛革命的果實所能作出的決定性的貢獻。

那個想法，依我們的觀點，也許是或者不是對工人階級及其作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代理的這個有歷史意義的角色缺乏信心。無論如何，這些模範的革命行動家所推行的絕大多數政策，就表示他們對工人階級及對人類所面對的歷史抉擇有信心。這個抉擇是：不前進到社會主義，就是走向野蠻主義，或者，它的命運更壞。

再者，我們不應該如此自大，以致過份簡單化這個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國家所處的困難地位：被有史以來最殘忍、最強大而且離它的海岸只有90哩的帝國主義巨獸所孤立、封鎖。

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敵人，其殺傷力之大，可以把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數倍毀滅。這個敵人曾

經重覆地顯示：當它相信殺死任何和每個要威脅它的階級利益的人是世人認爲它應有權利的時候，它對於將死亡和毀滅如雨般降落在城市 and 人民的頭上來保衛它的這種權利，決不會猶豫不決。

古巴的革命行動家們充分知道他們所負的責任，而且在比他們相信當前客觀階級力量關係將會容許走得更快更遠之前，他們將會三思而行。

我們應該繼續保持與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團結一致，而且對它的卡斯特羅主義／格瓦拉主義領導層批判地支持。這個領導層，幾乎在每個緊要關頭，都選擇了革命行動的道路。

古巴領導層的性格，具有一個比許多自認爲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派別更接近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還有，古巴共產黨的領導層曾經顯示出一種高度不尋常的、從它自己和他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也曾顯示出它有根據它的信仰而行動的勇氣。

古巴繼續是唯一尚未受到結晶化的官僚層所統治、尚未對在古巴投資的外國資本家們作出基本上但非策略性的讓步的工人國家。她作出策略性的讓步，是在一個被離它海岸90哩的殘忍的帝國主義巨物所統制的世界生存所必需的。

他們目前的焦點是要衝破美國佬帝國主義四十年來的封鎖和經濟破壞。這個工作焦點，是保衛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必不可少的。一切跡象顯示，革命的古巴已從斯大林主義的崩潰、蘇聯的解體中學到，古巴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骨架之內是沒有希望的。

似矛盾而正確的是，發展中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迫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到古巴來投資，特別依據在目前情況下古巴可以接受的條件。這就反過來爲美國大企業之儘管是半心半意的反對海爾姆斯——伯頓法案〔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禁止美國資本家（甚至全世界在美國有生意的資本家）到古巴投資的法案〕，增添了壓力。

美國資本家們也被他們自己的狹隘的經濟利益所驅使，因爲他們想利用古巴這個有可能賺錢的市場，爲他們自己的剩餘貨品、剩餘資本尋找出路。

當然，這對古巴有很大的風險。一群群資本主義企業家們的到來，帶了大量美元來投資，將會有矛盾的效果。在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減輕目前這個「特別時期」的極端困苦。在另一方面，帶了大量美元來的

投資家們，爲了想在有地位、有影響力的圈子中爭取朋友，也能對古巴社會有著非常有害的影響。

這就是一部份日益增多的美國資本家們贊成與古巴貿易的根本原因。他們知道，就這個觀點而論，這也是一個冒險，但是，他們爭辯說，由於封鎖了許多年都起不了作用，何必不打進裡面去，也許可以使一大部份的古巴人民腐化。

可是，卡斯特羅主義者們的經歷顯示，他們非常清楚這些風險。但是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和對革命的責任心來試圖突破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封鎖。

而且，我們對古巴革命家們所知的一切，也就是以上所說過的一切，都告訴我們，他們深刻地了解，他們目前的貿易政策，只是一個暫時的權宜之計，並不是永久的解決方法。

上面曾提過的卡斯特羅1998年7月26日的演說告訴我們，古巴的前景，仍然是與他們從革命開始的第一天就定下的前景一樣——將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擴展到全世界。但是，經驗教育了他們：他們早先的戰略有很大的缺陷。同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開展中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它就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觸發一段革命前的階級鬥爭時期。

當世界危機爆發的時候，它可能會以驚人的速度，把世界上的革命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野蠻主義和社會主義世界秩序之間的全球性鬥爭中，帶到古巴的一邊。

沒有人能夠預測，當世界資本主義的平衡崩潰的時候，古巴的革命行動家們，或者就這件事情而論，世界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其他派別——包括許多聲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派別——將會做什麼。不管怎樣，我們不能事先貶低古巴共產黨卡斯特羅領導層之奮起迎接那個對他們的革命前途以及人類前途有決定意義的挑戰的能力。

在六十年代初期，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羅／格瓦拉領導層，主要是尋找將他們的革命擴張到拉丁美洲去。這個前景，對他們而言應該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當時拉丁美洲的工農們，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是處於革命之前的醞釀時期中。

可是，由於古巴革命行動家們的錯誤的游擊戰略以及由於他們沒有與拉丁美洲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義搏鬥，他們就錯過了那個機會。

這一次，他們承諾要用不同的做法。除了從他們

的錯誤學到了東西以外，在帝國主義世界中日益高漲的階級鬥爭動力，有希望使古巴的革命領導人們比較容易地接受以第四國際《過渡綱領》的方法爲基礎的革命無產階級鬥爭戰略。

雖然在目前我們的世界運動還小，我們可以扮演一個主要角色來幫助古巴共產黨在將要來到的鬥爭過程中得出正確的教訓。但是，除非我們仍舊站在第四國際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理論和綱領的堅實基礎上，否則，以上這點決不能做到。

前蘇聯及其他蛻化中的工人國家

歐、亞蛻化中的工人國家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比任何人所預料的，都困難得多。世界各國的資本家們都承認，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真正由市場來推動之前，亦即是真正變成資本主義之前，還有一段長長的道路要走。

雖然它們在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上，都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力基本上仍然是停滯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中，群眾的生活水平——除了狹小層份的企業家、官僚和小資產階級之外——已經走向嚴重的衰退。

即使這些經濟中的某些部份有所擴張，它往往是限於經濟中的商業、財政部門和輕工業製造部門。

然而，重工業部門仍然很難私有化，因爲，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現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將這些古老的蘇維埃式的工業恐龍現代化，將會是無望地昂貴呀！

帝國主義試圖摧毀這些國家的基礎工業。在今日的收縮中、高度競爭性的世界市場之中，把它們私有化、現代化不能被認爲是好辦法。就算這些國家建造了新的、最新水平的鋼鐵廠、汽車廠和其他基本工業的工廠，被關掉的舊工廠工人太少會被重僱，因爲今日電腦化了的工廠只需要先前工作大軍的小部份。

使壞事情更壞的是，從基本上仍是國有的重工業中所得的利潤，最後就進了日益壯大的企業家階級、變質了的官僚和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外國銀行戶口。

但是，這些掠奪物的極大部份進了他們的帝國主義夥伴們的賬戶，極小部份，如果還有剩下的話，重新投資在工業發展上，這極小部份是工業發展的唯一真正的來源，因此是更合適地滿足群眾需要的一個根基。

中國

在這同時，當工業工人實際上收到支付薪金的支票時，他們的工資，往往是低於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做類似工作的工人所賺取的工資水平，更不必說西歐、日本和美國等先進國家了。

況且，這些蛻化中工人國家所生產的輸出品有競爭力的價格，事實上，是由國家為著官僚、本國和外國資本家的利益而津貼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津貼的泉源，就是這些社會還剩餘的社會戰利品。那就是，像非常低廉的房屋和公用事業、免費醫療服務、廉價公共交通——以及甚至於替代工資的實物支付——那樣的福利，都是隱藏的成本。這些成本都沒有加進賣到世界市場上的貨品價格中去。

蛻化中工人國家的農業

這些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在國有集體農場的基礎上經營的。

這些國家的農業已經證明是比工業更難私有化——因為小家庭經營的農地，即使有拖拉機，也比不上大型機械化集體農場的高效率。

再者，小型、私人擁有的家庭農場會很快地被迫破產，如果土地被回復為可以被抵押、被買賣的商品。

而且，如果資本主義式、大型工廠式的農場開始吞沒瀕臨破產的家庭小農場，大量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會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於是，我們就會見到數以百萬計的、以前是相對地寬裕的集體農場工人們（那就是他們在前蘇聯集團國家中的身份）墮落到我們今天在中國所看到的那種集體貧窮。

即使如此，儘管集體農業的殘存，它的剩餘產品的相當多部份，結果會通過這個或那個管道，落在官僚及其他寄生蟲的手中。這些產品也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出售。

因此，這些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社會、經濟成果，也作為津貼農業輸出品之用，使它們的價格可以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前蘇聯集團正在經濟上社會上被轉變為依賴他人的國家。因此，如果復辟者們成功地使這些國家完成向市場推動的經濟過渡的話，那末，它們就會變成為在帝國主義資本的支配下的半殖民地——不會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

自從斯大林主義崩潰、蘇聯解體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一直在興高彩烈之中。但是，像這個世界的其他事情一樣，外表常常是騙人的。

現在，美國和世界的帝國主義開始領悟：總的來說，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之企圖重新引進市場推動的經濟制度，不但沒有擴大了它的世界帝國主義，反而——直接、間接地——促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收縮的內在傾向。

跟隨著帝國主義的冷戰勝利而來的興高彩烈，已經轉變為它的相反面了。

第一，蘇聯的瓦解和冷戰的收場，在全世界的資本家們之間，放縱了一向被抑制的、尖銳化了的、爭奪收縮中的世界市場的更大部份的競爭。

第二，在蛻化中的工人國家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推動的經濟制度的轉變，不但受到仍遺留的反資本主義機構的日益增大的抵抗，而且受到工、農業工人階級因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起的日益上升的抵抗。

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一直在快速的進行，而且（與俄國不同）它的經濟一直在擴張，但是，它的發展是極為扭曲的，而且將會像東南亞和日本所發生的那樣突然收縮的。

再者，像前蘇聯集團的國家那樣，中國的發展，主要是在商業和商品化的建築、現代化通訊系統的發展、原材料和能源的採掘與輸出、輕工業生產的擴張以及建立為新、舊精英份子、新生中產階級而設的超級市場、時裝商店和奢華購物中心。

但是，在中國讓資本主義滲透的這種可疑的開放的背後，它的基本的工業基礎結構——例如鋼鐵、電力、汽車、卡車、拖拉機、金屬製造等等工業——所需要的資本，也就是僅僅為了維持它的過時的工業基礎結構所迫切需要的資本，卻正被耗用了。

（這些工業的現代化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只會使世界市場上的產品更加過剩。因此，世界資本主義決不會讓它的資本用在這種目的上。）

沒有它的工業基礎的現代化，中國及其他蛻化中的工人國家只能變成半殖民地社會，在經濟上受帝國主義世界的支配。

在這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先前受僱於巨大的國有企業的中國工人、數以千萬計的農場工人和農民，正被從工廠和集體農場顛沛到街頭、從鄉村顛沛到城

市，白費氣力地尋找根本在那裡也不會再有的工作。

但是，在中國，正像在所有這些蛻化中工人國家一樣，國有工業基礎結構，雖然一直在被磨損，但仍然是以資本主義方式在這些國家發展生產力的頑強障礙——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進化的這個時刻，這樣一種發展（即在這些國家以資本主義方式來發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

美國認為中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太慢

克林頓總統於1998年6月底到中國去，為中國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說明了他的條件。克林頓政府一直在要求中國更快速地移除讓美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中投資的一切障礙。

美國帝國主義目前的要求可歸納為兩點：一、更快速地拆去中國的國有基本工業；二、中國必須對國內外的產品、對美國及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結束它的大部份仍然是未經觸動的中央政府控制。

儘管這個斯大林主義政府準備慢慢地滿足這些要求，克林頓卻不顧一切地要它走得更快——而且當然要它在規劃中的、帝國主義接管中國經濟的最好部份的時候把首位預留給美國公司。

（那就是資本主義傳媒獨佔關於美國要求「中國停止違反人權」這種宣傳的真諦。美國帝國主義者在越南、古巴和伊拉克——這裡只舉出太多受其害的國家中的三個——之違反人權是太出名了，難道認真的人真會相信他們要「保衛」中國的人權嗎？）

（美國資本主義也是以世界上從以色列到非洲、亞洲、中南美洲、甚至美國本土最壞、最血腥的人權違反者的主要保護人出名。）

而且，使中國統治集體的不牢靠的地位達到最高點，他們正以極大的恐慌觀察亞洲崩潰的經濟。他們看到，日本和太平洋周邊的國家正以貶值的貨幣和更廉價的輸出品，不但使整個世界市場不穩定，而且大大地削弱他們的輸出。

（中國威脅要貶值人民幣，迫使美國和日本支撐日元，至少直至克林頓訪華以後。）

再者，中國的政府，懷著嚴重的預感，觀看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它的貿易、貸款機構把「緊縮措施」強加給世界的依賴國家。

它看到國際貨幣基金會怎樣毫無顧慮地迫使印尼把嚴苛的緊縮措施，強加給該國極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低下中產階級。它也看到那件事情怎樣導向一種

「社會不安定」，迫使那個專以屠殺來鎮壓人民的蘇哈托獨裁者退位。

最後一點是，中國的統治集體知道，印尼的「社會不安定」只是暫停而已，所以，群眾們在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由以後，會評估這個新局面，當他們明白「新」政府不能也不會結束他們的痛苦的時候，另一個更廣大的暴動一定會發生的。

因此，中國斯大林主義復辟主義政權雖然想達成協議，它還是很怕太快地把太多人趕離他們的工作。他們完全了解，資本主義傳媒所稱的那個「社會不安定」，正在蠢蠢欲動，正在他們自己的鎮壓政權的蓋子下，積累著爆發的壓力。

1998年6月22日的《紐約時報》展示了美國統治階級的看法：

中國對於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所必需的經濟改變還沒有準備就緒……，雖然希望成為這個全球貿易團體的會員國曾經是中國領導人們的政治目標……。

在一個大部份仍然是國管的官僚經濟中，有些部門和工業不但擔憂國內境況不佳的工業過早暴露給外國的競爭，而且擔憂國營的商品貿易商（2）和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服務部門的獨佔地位會完結。

該報較早前（6月17日）的一篇報導日本下降的幣值——這使它的輸出品更便宜，因而傷害到中國的輸出——的文章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減慢意味著失業的劇增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安定的可能性。」

這份美國資本主義的主要喉舌埋怨說：「中國與大多數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主要不同是，它的貨幣不是完全可兌換的，因此不容易受到投機性的攻擊。」

（3）

所以，中國的貨幣是否貶值，不是要看投機者，而是在於它的政府的決定。因此，中國這邊也有力量，克林頓也必須作出讓步。

因此，據報導，克林頓必須在訪問中國時，試圖說服主人「抗拒任何要它貶值的誘惑」。

1998年6月28日的《紐約時報》引用了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C.Fred Bergsten的警告：「中國一定要守住這個堡壘。如果守不住，如果〔阻擋全球貨幣混亂的〕強大中心垮掉的話，馬上就會一片混亂。」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對它的貨幣以及對它整個經濟的還遺留著的控制，以及最終地中國對其所有內部事務的政治控制，不是讓位給帝國主義的要求，

就是讓位給中國工農的革命要求。

蜕化中工人國家的綜合革命

不管朝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有多大，快將來到的全球經濟危機將會摧毀這些混合社會。國有工業、國有集體農場受危機的影響可能會最小，而且更能夠保持生產——因此證明它們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國有的優越性。

官僚管理及其貴族層，因為早已被人看不起，就會開始自動變弱，因此會比較容易被推翻。被偷盜的國家財產將會傾向於再度被受苦難的工、農業工人所沒收。

緊急援助這些經濟，即使在目前，也是超出資本主義世界的負擔。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發生一次崩潰的時候，祈求帝國主義來緊急援助這些或任何其他國家，更是不可想像的。

唯一的力量，能夠阻擋反對官僚——資本家及來自受過教育的小資產階級的混合政權的一次綜合革命的，可能會是帝國主義的軍隊。

但是，進行這樣一種反革命干涉到底需要多大的帝國主義兵力，是難以想像的——不過其規模一定會在越南、其他殖民地國家或前南斯拉夫所需要的大得很多。

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世界帝國主義之把北約組織深深地擴張到俄羅斯近鄰的前蘇聯集團國家，就是準備讓它的軍事力量去鎮壓將來必然會興起的綜合社會、政治革命。

但是，美國、歐洲軍事力量企圖在起義的前蘇聯集團國家重新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可能會面對極大的潛在革命的力量。再者，僅僅因為革命起義而派遣軍隊去鎮壓，首先就會引起幾乎是全局的反干涉運動，也許甚至在開始開槍以前就會發生。

把不斷革命的邏輯推衍到它的終極的結論，北約的軍隊，也許終極地會被派遣去鎮壓世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的起義。

在帝國主義世界的各地，革命工人與侵佔部隊之間的親善，會難以防止，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要比在亞洲、非洲小得多，更不必說階級團結這種社會本能的革命影響力了。

最後分析起來，世界資本主義前途暗淡的程度，在帝國主義心臟地帶，不比在東歐、亞洲、非洲少些。危機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不解決無產階級領導危機的問題，最有利的革命時機也將會失掉的。如果那情況發生的話，歷史將會進入一個可怕的資本主義野蠻主義時期，如果它不是被燒成核子炭渣或者被輻射塵所破壞的話。

但是歷史有另一條道路能夠走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第四國際是1938年由托洛茨基創立來實行將近一個世紀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始的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鬥爭的。它的建黨的綱領文件，《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奠定了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主觀和客觀的因素，它由《過渡綱領》的開頭幾句簡潔地總結如下：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

「無產階級革命之經濟的先決條件，一般的已達到了資本主義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人類的生產力停滯不前。新的發明與改革已無從提高物質財富的水準。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恐慌的條件之下，行情性的經濟恐慌嫁給群眾的剝奪和痛苦更其沉重。而不斷增長的失業反過來又加深國家的財政恐慌，且破壞不穩定的通貨制度。民主政制與法西斯政制一樣，狼狽地從一個破產走到另一個破產。」

沒有群眾性的世界革命工人黨，社會主義革命及它的充分興旺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才能挽救人類。

註：

- (1) 見Walnut出版社的卡斯特羅1962年3月26日演說詞的小冊子《菲德爾·卡斯特羅譴責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 (2) 「國營的商品貿易商」是指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仍然餘留的、雖然已被減弱的成果之一——國家對外貿的壟斷。
- (3) 這代表他們的資本主義革命的另一個仍然餘留的成果。

〔全文完〕



《先知三部曲》評介（一）

馬騰雲

《先知三部曲》

伊薩克·多依徹著

王國龍、周任辛、施用勤、張冰、劉虎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年出版

〔編者按：據讀者報道，北京中央電視台幾月前在「讀書時間」欄播出：1999年全國十大好書中，多伊徹這套《先知三部曲》獲名列第七。從這個訊息可見此書受中國讀者歡迎的程度。〕

多依徹著的《先知三部曲》分別在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在英國出版了，該書立即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譽為最詳盡、最全面的托洛茨基傳記，早已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今天在中國翻譯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夠欣賞到這本優秀的作品，對研究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

書名用「先知」三部曲表明托洛茨基不少的預言得到應驗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萬能的「先知」。多依徹同樣指出了托洛茨基沒有應驗的預言。由此可見，作者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論托洛茨基。

作者為了寫好這本傳記，博覽群書，取材非常廣泛，除了《托洛茨基全集》，托洛茨基檔案之外，還使用了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日記、札記、著作、多種報章，雜誌，以及多種會議記錄，還訪問了托洛茨基夫人、秘書及托洛茨基的友人、相關的政府人員、政黨人員等。

作者正是在廣博的資料基礎上描繪了俄國革命的壯麗場面，托洛茨基機智、靈活、勇敢的領導了十月武裝起義。托洛茨基克服了種種困難與阻力創建了紅軍、進行艱苦的戰鬥，戰勝了白衛軍，取得內戰的勝利。

作者澄清了長期以來對托洛茨基的誤解和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重要理論。人們長期以來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說是抄襲了德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1904年，托洛

茨基在德國帕爾烏斯家裡住了一個時期，這更使人們相信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來自帕爾烏斯。帕爾烏斯提出俄國革命建立工人政府，而托洛茨基不是也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嗎？表面上來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似的。但是多依徹指出，帕爾烏斯要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托洛茨基要建立的工人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帕爾烏斯認為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則認為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故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有本質上的不同。

無疑，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都是來源於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托洛茨基1904年住在帕爾烏斯家裡時，還沒有形成「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根據1905年俄國革命建立工人蘇維埃的實際革命經驗，在1906年監獄中醞釀而成的。他是把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結合俄國1905年革命經驗發展而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精闢的闡述了俄國的不斷革命，並不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才有不斷革命論思想。作者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已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他們的思想從不同的出發點，通過不同的過程向前發展，走向他們此刻的會合點。」（《先知三部曲》（以下簡稱《先知》）第1卷第285頁）。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宣稱，對俄國革命問題「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

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一個組成部份，於是有人攻擊托洛茨基要輸出革命。作者指出，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是反對輸出革命的。他反對進軍波蘭華沙，「他（托洛茨基）在談到波蘭戰爭的後果時提出警告，反對用武力輸出革命。這種警告像一條紅線般地貫穿在他這個時期的文章和演說中。」「在一次辯論中，他憤怒地指出，有誰想靠紅軍作戰

取代外國的革命，那麼，就讓這個人給自己脖子上掛上磨盤投身到海裡去更好。」（《先知》第1卷，第516-517頁）。

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確信歐洲、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處境所驅使必然走革命的道路。「任何代替他們的革命或用刺刀試探和促使他們革命的企圖都是絕對有害的。」（《先知》第1卷第516頁）。所以，托洛茨基的「推動世界革命」並不等於「輸出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紅軍佔領進行的「輸出革命」，最後的結果：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首先脫離蘇聯獨立，恢復資本主義。隨後是東歐諸國先蘇聯而瓦解，走向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八十年代，蘇聯對斯大林批判的時候，有些蘇聯學者，批判斯大林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實行了托洛茨基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多依徹仔細地把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的主張區分開來，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並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1925年至1927年托洛茨基或聯合反對派多次提出工業化計劃和農業集體化計劃。早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就指出，工業生產緩慢，遠遠落後於私人農業經濟。工業品價格高而農產品價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越來越大，這就會破壞工農聯盟。要縮小「剪刀差」就應降低工業品價格而不是提高農產品價格。故此，就要使工業合理化、現代化，就要進行工業化計劃，進行計劃經濟。

1926年7月，聯合反對派（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聯合反對派），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出稅制改革，提高產業工人工資，對新經濟政策產生的資產階級按照利潤交納高額稅（累進稅）。而在農村，對富農徵收高額稅（累進稅），對貧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免稅。應該開始進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農業集體化。政府以信貸政策資助農民購買農業機器。同時，反對派提出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五年計劃。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拒絕免除貧農捐稅、提高富農稅額，也拒絕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到了9月，當權派爲了免使工人爲反對派爭取過

去，搶先允諾提高低工資工人的工資。「斯大林開始盜用托洛茨基關於工業化政策的思想時，進一步混淆這個問題。他到那時爲止，還絲毫沒有準備去實現全面工業化；但在形成的決議和聲明時，他卻從托洛茨基那裡抄襲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整段整段的文章。」（《先知》第2卷第308頁）

1927年11月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制訂五年計劃、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提出的《政綱》，批評斯大林的中央準備向大會提出的《提綱》。托洛茨基批評道，中央的提綱提出了工業化，製定了五年計劃，進行農業集體化，報刊上宣稱「向左的急劇轉變」。其實，恰恰相反，口頭上宣傳「轉變」，實際上仍像以前一樣向左派開火。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提綱。決議開展農業集體化及工業化，通過了五年計劃，規定年增長率爲8-9%（托洛茨基提出將速度提高到12-18%，而被否定）。正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之前所指出的，中央並沒急劇轉變，只是口頭上宣稱要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928年，糧食問題更爲嚴重，國家的糧食收購任務沒有完成。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右派的同時，號召向富農進攻，要加速工業化。1929年4月召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五年計劃方案，進行工業化計劃，採用了托洛茨基工業化計劃的一些指標，以及電氣化計劃、建設水電站，開展農業集體化。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實行農業集體化。

五年計劃實施一年後，工業化計劃取得了進展，成績顯著。斯大林在1930年提出加速工業化，拋棄托洛茨基的指標，從工業化12%提高到30-48%，並且五年計劃要四年完成。對農業集體化更是不顧農民是否自願，不顧工業是否能提供農業機器，用鞭子把農民趕入集體農莊。對富農則是掃地出門，把幾百萬不願意農業集體化的富農、中農、貧農趕出家園，遣送到邊遠地區。強行農業集體化，使農村呈現一片悲慘景象。先是農民大肆屠殺牲畜，大吃大喝，到後來是饑荒。

1929年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得知中央反右派，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都很高興，認爲反對派的綱領得到實施了，中央會召回反對派恢復工

作。托洛茨基持冷靜的頭腦，靜觀事態的發展。1930年得知工業化不顧人力物力，不顧各個工業部門的平衡發展，過份側重於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爲了實現過高的生產指標，追求產量而不顧產品質量，造成大量廢品，浪費了物資與人力。農業集體化更不是按照托洛茨基主張的，以農民自願爲原則，以工業能提供農業機器爲前提，長期的逐步的進行；對富農徵收高額稅而不是消滅富農。那就完全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綱領，而實行的是斯大林的綱領。托洛茨基批評道，斯大林是「從右傾轉變爲冒險主義」。（《被背叛的革命》，第34頁，春燕出版社，1939年）。

* * * *

托洛茨基長期爲俄國革命而鬥爭，1905年革命，他就是俄國第一個彼得堡工人蘇維埃主席。1917年10月革命，就是在彼得堡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領導之下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多依徹稱譽托洛茨基是「共和國之父」）。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創立了紅軍，轉戰各個戰場，抵禦多個國家的干涉軍，消滅了反革命的白匪軍，取得了內戰的勝利。托洛茨基對革命對蘇維埃國家作出卓越的貢獻。托洛茨基在蘇聯人民中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僅次於列寧。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托洛茨基與列寧是蘇聯人民經常歡呼的兩個名字。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逐漸地被孤立，被排擠，被革職，被開除黨籍，被流放，最後被驅逐出國。

有著崇高地位、卓越功勳的托洛茨基爲什麼會失敗？這是傳記讀者所關心的問題。多依徹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全面的詳盡的描述托洛茨基失敗的整個過程；用各種色彩的線條、從各個角度描畫出托洛茨基的「失敗圖」。

1923年列寧中風，病倒在臥榻，不能視事。掌握黨中央決策權的政治局七個委員中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抱成一團，被稱爲「三駕馬車」。其他四人：列寧病倒，布哈林，托姆斯基是附和於三駕馬車，加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一個六人的秘密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外。一切問題都預先在這個秘密核心組織中作出決定。他們訂立了攻守同盟，保證彼此不進行爭論、攻擊，而要找尋根據、集中攻擊托洛茨基。在地方組織也有類似的秘

密核心組織，以嚴密紀律與莫斯科的「六人集團」聯繫，他們使用密碼聯繫。黨和國家幹部的任用都要經過選擇，選擇的標準只有一個，即要反對托洛茨基。這個組織在列寧病逝後就公開進行，人員的選擇直到基層組織，如不表現爲反托洛茨基的人，就不能擔任基層的負責人，（參見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36-437頁）

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員又是組織局書記處總書記。實行的是委任制，人事的安排是由書記處任命。斯大林掌握了任命人員的大權。黨十二大後，斯大林加緊把可能追隨托洛茨基的人，從中央到各省的重要職位上清除掉，然後任命追隨三駕馬車的人。那些被任命爲地方黨書記的人很明白，他的地位不依賴當地黨組織，而是依賴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斯大林。他們俯首貼耳地聽命於總書記，由書記們組成的群體逐漸以自己「取代」黨，他們習慣於在總書記的命令下行動，這個總書記到後來就取代黨。在表面上黨仍然是受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支配，但後來黨代表大會僅僅成爲騙人的招牌。照例只有總書記任命的人才有機會當選爲代表。黨代表大會成爲總書記操縱的代表大會，那就更不用說中央委員會了。

1923年2月初，列寧在病中嚴厲批評工農檢查院，並將此事通知政治局。雖然斯大林早已離開工農檢查院，而列寧的批評是指斯大林任職期間的錯誤：「官僚主義惡劣作風」、「反覆無常」……等等。列寧要工農檢查院作一次大檢查，縮減編制，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執行工農檢查院的職能。托洛茨基要求公佈列寧的批評，但政治局拒絕了。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提出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所屬機構進行大改組計劃。托洛茨基的方案與列寧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駕馬車竭力誇大這些不同。三駕馬車認爲若要毀掉托洛茨基作爲列寧的接班人，最好搞一場流言攻勢，說不論什麼問題上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他們對托洛茨基的這些指控，寫進政治局會議的記錄裡，然後借口要檢查而向全體中央委員公開，而中央委員很快又秘密地洩露給下級。於是造成了無論什麼問題，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假象。

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有些委員……說列寧同志的方案在維護黨的團結，而我的方案則是製造分裂。這種含沙射影的說

法是由一個小集團泡製出來的，而這個小集團卻向全體黨員隱瞞列寧的信件。我向政治局提出發表列寧的信件，政治局卻不同意發表。」最後他說：「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黨面前揭露事實真相的權利，駁斥這種含沙射影的攻擊」。托洛茨基只是採取威脅的態度，他並沒有實行把列寧的信件公之於眾，也就不可能擊破那些流言蜚語，含沙射影。

1922年12月，列寧與托洛茨基一次談話，列寧要與托洛茨基「聯盟」來反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關於格魯吉亞問題，列寧得知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反對斯大林的大俄羅斯主義，列寧準備好在黨代表大會上向斯大林投一顆「炸彈」。「列寧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軟弱和動搖，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作出的『不可靠的妥協』……要不發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夥進攻」。（《先知》第2卷，第99頁）。列寧決定要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三駕馬車得知列寧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猛烈反對斯大林。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駕馬車來看望托洛茨基。他顯得垂頭喪氣，準備接受懲罰並安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德報怨。他忘了列寧的告誡，接受三駕馬車的「妥協」。列寧打算把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撤職，把奧爾忠尼啓則開除出黨至少兩年。托洛茨基卻向加米涅夫保證，他本人不會建議採取如此嚴厲的報復舉動。他說：「我反對清除斯大林，反對開除奧爾忠尼啓則，反對解除捷爾任斯基的職務……但我實質上同意列寧的意見」。他所要求於斯大林的僅僅是改正自己的行為方式，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停止侮辱格魯吉亞人，修改格魯吉亞問題的決議案，並保證格魯吉亞人和烏克蘭人的民族權利。基於這些條件，托洛茨基準備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職務。

列寧對斯大林雷霆之怒，使斯大林面臨著政治毀滅的威脅，如今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寬恕之手，真是感激涕零，於是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條件完全一一照辦。（《先知》第2卷第97-102頁）

托洛茨基沒有按照列寧所囑託的堅決的毫不妥協、動搖的反對斯大林等人，撤他們的職。托洛茨基卻去和三駕馬車妥協，鑄成了大錯！完全可以借助列寧的權威把斯大林打下去，而取得勝利，卻去寬恕斯大林，挽救斯大林，真正是「姑息養奸」（註）最後托洛茨基的失敗，這是關鍵的一著錯棋。

斯大林不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沉默寡言，不善言詞，托洛茨基不把他看在眼內。列寧從斯大林粗暴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事情上看到了斯大林暴戾的本質，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而托洛茨基卻沒有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沒有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是把季諾維也夫看作為政治對手。

1923年4月，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了。列寧再次中風，不能出席大會。托洛茨基並沒有遵照列寧所託在大會上向三駕馬車投放「炸彈」，托洛茨基遵守他對三駕馬車的諾言。他在大會上沒透露他與三駕馬車的分歧，而默默的坐著，而三駕馬車的代理人卻在代表中間散播謠言，說托洛茨基會是法國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以此來抵消在開幕式上自發的向托洛茨基致敬，及黨組織、工會、工人和學生團體向列寧、托洛茨基致的賀詞。

三駕馬車在大會呼籲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季諾維也夫宣稱，「對黨路線的任何批評，即使是所謂『左』的批評，目前在客觀上都是孟什維克式的批評」。季諾維也夫定下這個調子就是不容許對黨中央任何批評。如果批評黨中央就被視為孟什維克，是黨內的反對派，就要遭到鎮壓。季諾維也夫這個「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卻為大會所通過。就是這樣，及後的托洛茨基反對派遭到鎮壓。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擴大中央委員會重新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托洛茨基沒有阻礙這項任命。斯大林逃過了列寧的難關，保住了原職，保住了人事任免的大權。這是後來斯大林取得勝利、托洛茨基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1924年《托洛茨基全集》中的一卷出版，序文是《十月的教訓》，揭露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十月革命起義，刺痛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瘡疤。季諾維也夫暴跳如雷，他以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來回擊托洛茨基，於是掀起了《不斷革命論》的爭論。三駕馬車在群眾中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進行歪曲，說托洛茨基輕視農民，不要農民；說《不斷革命論》要鼓吹世界革命，輸出革命。

蘇聯人民經過世界大戰，三年內戰的困苦，蘇聯人民已疲乏不堪，他們不願意打仗，他們祈求過著安穩的日子。當三駕馬車把《不斷革命論》歪曲，說托

洛茨基又要發動世界革命、輸出革命的時候，群眾就不願意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三駕馬車也就達到把托洛茨基的威信打下去的目的。

托洛茨基對此說道：「列寧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復回到領導崗位上來，使不確定的臨時局面長達兩年之久。如果革命發展處於上升階段，這個拖延對反對派將是有利的。但當時革命正在國際舞台上遭到一個又一個的失敗，這樣的拖延只能是對民族改良主義有利，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斯大林官僚主義，而對我和我的朋友不利。」

「以徹頭徹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斷革命論，對它一無所知甚至愚蠢地造謠攻擊，就是從這些心理源泉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時時事事都為革命，也應該為自己』這種思想情緒可以譯成：『打倒不斷革命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嚴格要求和政治嚴格要求的鬥爭，在這些人手中，逐漸採用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方式。在這面旗幟下進行著布爾什維克中的市民解放。這就是我喪失權力的原因，就是它決定了喪失權力發生的形式。」（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40-441頁）。

1924年1月16日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開幕，托洛茨基評擊老近衛軍的《新方針》在代表會議召開之前還沒有發到各地方支部。托洛茨基因病遵醫囑去蘇呼木養病，沒有出席代表會議，而三駕馬車準備好一個決議，譴責托洛茨基及46位簽名者是「偏離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派性」。由於會議的投票完全被書記處操縱；因此，只有3票反對譴責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各黨支部多數票贊成反對派，首都衛戍部隊黨支部有三分之一贊成反對派，學生支部也是如此。

列寧逝世，斯大林故意把列寧出殯日期說是星期六（1月26日），其實出殯日期是1月27日舉行。斯大林用此詭計，使托洛茨基不能趕來參加守靈和葬禮。出殯的行列不見托洛茨基，三駕馬車以此來使群眾猜疑托洛茨基與列寧有芥蒂，托洛茨基不會是列寧的接班人。

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落實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反對托派反對派的決議，越來越多的反對派擁護者被開除、降級或受到懲罰。

為紀念列寧徵收新黨員，有24萬名工人參加黨。其中有真誠為共產主義奮鬥，也有不少是投機分

子、鑽營者。「『為列寧徵集新黨員』，在實際上給三駕馬車輸送了一批俯首貼耳的追隨者，他們很快就要驅使這批人去與反對派鬥爭了。」（《先知》，第2卷第148頁）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樣操縱在書記們的手裡。代表的選舉是間接的，需要通過好幾級選舉才能產生。而在每一級，書記們都盯著有多少反對派的同情者當選，然後他們想方設法在高一級選舉中使其落選。莫斯科基層支部選舉中投票贊同反對派的選票究竟有多少，從來沒有公佈過。46人聲稱：在比基層支部高一級的地區會議上，他們獲得的選票不少於36%；而在更高一級的州會議上獲選比例減少為18%。這個說法沒有被否認。反對派的結論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數從基層支部到最後選舉一直按照相同比例減少，反對派仍為莫斯科組織最大多數（《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第131-133頁）。差不多可以肯定，這是真實的；不過，高踞於最大多數之上的卻是書記們。

在表面上是民主討論、民主選舉，實質上總書記斯大林操縱了會議，控制了各級黨支部的選舉，任何民主討論、民主選舉的「民主」都成為掩飾物。托洛茨基反對派及後來的聯合反對派，不管意見是多麼正確，也無法衝破這個怪圈。在一切討論、一切選舉中，反對派就必然歸於失敗。

（未完待續）

註：

後來托洛茨基解釋：「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及他的遺囑還無人知曉。倘使我獨自行動，就會被說成是我個人要爭奪列寧在黨內和國家內的地位。一想到這，我就會不寒而慄，我認為這會在我們隊伍內引起相當大的混亂。即使是我們勝利了，我們也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我的生平》下冊，第53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Stop the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dissidents!

Zhang Kai

The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has continued since mid July 1999 when massive arrests were made and over 30,000 practitioners in over 30 cities were spurred to protests on the street.

On 26 Nov 1999, it is reported that in a report to a convention of 3,000 officials, Li Lanqi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CP Political Bureau and deputy minis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nnounced that from July 20 to Oct 30, at least 35,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petitioning in Beijing were arrested. Not one day passed in calm, arrests were made every day, and Li expressed tha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was a long-term, arduous and complex battle.

On the same day, the *People's Daily* in Beijing and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published commentator's articles saying tha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must be carried through to the end, since this had put the Party's future at stake.

Qian Xiaoqian, Head of the 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State Council, explained on Dec 2 to four media presses, that "the so-called 35,79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may refer to the people who were attempting illegal gathering and were either persuaded to leave or brought away from public places in Beijing." Qian also disclosed that the key members of the Falun Gong Study Association, including Li Chang (Head of the Computer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Zhiwen (engineer of Headquarters, Railway Supplies), Ji Liewu (general manager of a mainland metal company in Hong Kong), Yao Jie (head of the Party office of an estates company in Beijing), had been prosecuted and had, respectively, been sentenced to 18, 16, 12 and 7 years in jail on the criminal charge of sabotag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state law, and inducing deaths using religious sects. He said that on 25 April 1999, Li Chang and others organized and incited over 10,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and outside Beijing to illegally gather for a sit-in protest in the vicinity of the Zhongnanhai [central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It is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ir detention, large number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tortured. Up till mid April 2000, at least 15 have been reported to have di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orture. Dozens have conducted hunger strikes in jail. Many have been sent to mental hospitals. It is reported that since early December 1999, about 50 practitioners had been sent to the Zhoukoudian Mental Hospital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a letter smuggled out of jail by Li Qun, instructor at the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e was sent to the Nanjing Mental Hospital for her insistence on practising Falun Gong, and she was compelled to take drugs that were damaging to the brain.

Continuous arrests have not deterred the wave of protest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of 2000, at least 500 people were arrested for practising Falun Gong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Throughout China, in about 40 cities, mass practice of Falun Gong took place, and over 2,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After the New Year, over 5,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ll over China were sentenced to 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over 10,000 were detained for a short period, and 300 were sentenced to jail.

On March 1, Jiang Zemin reportedly attended a joint meeting of the police,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judiciary, and condemned the police for not having made a serious effort in containing the Falun Gong, which caused the Party Central to continue to be worried.

On April 13, five day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as to vote on a US motion to condemn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several hundr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gain staged a mass demonstration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were all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after being beaten up.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April 25 Falun Gong demonstration at Zhongnanhai, over a hundred

practitioners broke through the cordon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staged a demonstration and were then taken away.

According to many senior or retired people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their practice cured them of disease and improved their health. Among these people were many high ranking intellectuals or professionals. 22 professors and ot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d signed a joint statement on 1 Jan 1999 on their positive appraisal of Falun Gong as a health practice. General Yu Changxin, a 74-year old retired professor of the Airforce Command Academy, was sentenced to 17 years in jail on 6 Jan 2000 for his insistence on the practice. Wu Shaozu, Director of the State Sports Bureau, was also an advocate of Falun Gong and was dismissed from his position on April 19.

After the 25 April 1999 siege of Zhongnanhai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the initial first weeks, Party members and state officials were prohibited from practising Falun Gong. On July 25, Falun Gong was denounced as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On Oct 15, the repression further escalated and it was denounced as a religious sect. Up to now, 15 religious groups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religious sects, including 14 christian groups and one buddhist group. Their membership i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5 million.

Around the same time, a qigong group named "Chinese life-nurturing and intellect-developing qigong" (CLIQ) was banned as "illegal". The group claimed to have a membership of 38 million. In its petition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this March, CLIQ said that all its 3,000 institutions held lawfu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licences, yet with an order from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central authorities, all operating licences were taken back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stitutions were closed down, huge amounts of assets were confiscated. All these were blatant viol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petition called on NPC delegates to look into the question of Party leaders always overrid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and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revoke its decision to ban 3,000 CLIQ institutions, return the right of livelihood to the 400,000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and set free 600 CLIQ leaders including Yan Shanjuan, former delegate of the Beijing People's Congress. Several other qigong organizations claiming membership of tens of millions were also banned, such as "Society to Study Supernatural Talents in China". Some were placed under strict monitoring, publications were banned and public practice prohibited.

Apart from the above, many oth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lso came under attack and were declared illegal. According to Liu Baocheng, Head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ivil Affairs Bureau, up to the end of November 1999, 80 "illegal civil society groups" were uncovered in Beijing, a 42% increase compared to 1998; among them, 62.5% were detrimental to national interest, and disruptive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13 years since 1986, a total of 467 illegal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Beijing had been uncovered and handled. (Hong Kong's *Ming Pao*, 17 Jan 2000)

Th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s continues. Mor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continue to be persecuted and given lengthy sentences. Bulletin for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launched in December last year, was banned in January and its four leaders, Xiong Jinren, Chen Hui, Hu Jin and Wang Yiliang, were arres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our scholars advocat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ere being criticized or dismissed; they were Li Shenzhi, Mao Yushi, Fan Gang, and Liu Junning.

Th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s and clampdown on civil society activities illustrate the fears of the rulers about their inability to control. To counter the wave of repression, the demand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l dissidents in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and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should be prioritized.

28 April 2000

目錄

香港	2	保衛新聞言論自由！反對京官干預侵奪！.....	微波
	4	仁政還是苛政？助貧還是欺貧？.....	振言
台灣	6	台灣大選面面觀.....	軍行
中國	10	停止壓制，釋放法輪功等異見者！.....	張開
	14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帝國主義廣開門戶.....	《工人先鋒報》
	16	中國政府承認有三億貧民.....	史丹輯譯
國際	17	西雅圖「反世貿組織」運動內望.....	拉文德
	20	工人是歷史的動力.....	哈爾曼
	22	慶祝日本廢除外僑指模制度.....	T君
	22	車臣戰爭——俄聯盟民族問題的後遺症.....	索納特
	24	普京尋求一個「強國」.....	喀魯克
	27	美國插手哥倫比亞，和平前景暗淡.....	哈特曼
	29	英國工黨左派改良主義的局限性.....	特爾弗
	32	資本主義垂死掙扎與無產階級領導層危機(三)《社會主義者行動》	
書評	38	《先知三部曲》評介(一).....	馬騰雲
英譯	43	Stop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dissidents!....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7 ISSUE 2 2000.4.30

HONG KONG

- 2 Defend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Wei Bo
4 Government policy to rob the poor..... Zhen Yan

TAIWAN

- 6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Jun Xing

CHINA

- 10 Stop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dissidents!.. Zhang Kai
14 WTO entry means mass unemployment, plunder..... *Workers Vanguard*
16 Chinese government admits poverty..... tr. Shi Dan

INTERNATIONAL

- 17 Inside the 'Stop WTO Movement'..... H.Lavender

- 20 How workers' struggle shaped the 20th Century..... C.Harman
22 Japan: abolition of foreigners finger print system..... T
22 Russia: Chechen war legacy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A.Thornett
24 Putin seeks a 'strong state'..... S.Crooke
27 Colombia: US steps up intervention..... A.Hartman
29 Tony Benn and the limit of Left Reformation..... D.Telfer
32 Death Agony of world capitalism
and crisis of proletarian leadership(3)..... *Socialist Action*

BOOK REVIEW

- 38 *The Prophets*..... Ma Tenyun

ARTICLE IN ENGLISH

- 43 Stop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dissidents!.. Zhang Kai